

上海论坛动态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www.shanghaiforum.org

第7卷 第2期 (总第26期)

2014.09

新闻

- > 上海论坛(2014)隆重开幕
- > 上海论坛(2014)媒体拓展会
- > 新书发布

聚焦

- > 上海论坛(2014)开幕式大会致辞与演讲
- > 闭幕式大会致辞与演讲

专题

- > 上海论坛(2014)嘉宾访谈
 - > 嘉宾建言
- > 分论坛观点集萃

共识

- > 上海论坛(2014)共识

信息

- > 上海论坛(2015)子论坛承办申请公告





上海论坛动态

《上海论坛动态》是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公开出版物。其目标是扩大上海论坛在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新闻发布、论坛专题、相关活动、重要事项和进程等，并对论坛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以促进上海论坛的更好发展。

主办方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编委会

主任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朱之文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主编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

执行副主编

陈寅章	复旦大学校长外事顾问
张怡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
尹大焯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

副主编 (以姓氏字母为序)

陈文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陈诗一	复旦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系副主任
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分党委书记
金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行政室室长
梁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彭希哲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任远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中心执行主任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

罗倩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黄晨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执行编辑

李明镇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科长
常瑜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丁常昕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胡唯哲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黄昊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钱斯蕴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沈婵婧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沈郊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吴涛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夏梦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徐晓羽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姚思文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张圆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赵信敏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朱红蕊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官员

目 录

第7卷 第2期 (总第26期) 2014.09

02 新闻

上海论坛 (2014) 隆重开幕
上海论坛 (2014) 媒体拓展会
新书发布:《Shanghai, Global Contender: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05 聚焦

05 开幕式大会致辞

杨玉良 中国复旦大学校长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韩升洙 韩国前总理
方 军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司副司长
屠光绍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12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dam Pos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
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17 闭幕式大会演讲

金范中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邱丽萍 中国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研究副总监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
简大年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24 闭幕式大会致辞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25 专题

25 嘉宾访谈

Robert J. Shiller 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Grubb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
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校长

44 嘉宾建言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dam Pos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David R. Mares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校长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
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
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刘利刚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谢湧海 中银国际副总裁

45 分论坛观点集萃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张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刘利刚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Michael John Grubb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
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Robert Ross 波士顿学院政治系国际关系学教授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赵晓斌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徐剑锋 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癌症遗传研究中心主任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
Park Youngah 韩国科学技术评估计划研究所所长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inod K. Aggarwal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
朱介鸣 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组主任
燕 爽 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Caner Bakir 全球化、和平与民主治理联合会联合主席
William Powderly 华盛顿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姚 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

51 上海论坛共识

上海论坛 (2014) 共识

52 信息

上海论坛 (2015) 子论坛承办申请公告

上海论坛（2014）隆重开幕



“

2014年5月24日，上海论坛2014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聚焦于“亚洲转型：寻求新动力”，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出席开幕式。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此外，教育部外事司方军副司长代表郝平副部长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之文主持。

”



开幕式后，围绕本次论坛主题，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迈克尔·格

拉布（Michael Grubb），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沙祖康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世界、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赢得了与会嘉宾的阵阵掌声。朴仁国主持了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于5月24日至26日在上海举行，下设九个分论坛，从“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与亚洲面临的新挑战”、“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优化”、“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优化”、“变化中的亚洲劳动

力市场”、“城市化的生机与城市的未来”、“亚太合作的新视野”、“环境与卫生系统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迈向包容性发展：绿色能源转型与环境气候治理”等视角出发，共话上海、中国和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

本届上海论坛将组织举办多场高端对话，重点聚焦“雾霾笼罩下的中国与亚洲——环境安全及科技、政策的应对”、“亚洲经济增长瓶颈，谁能率先突破？”、“转型中的亚洲城市与社会发展”、“社会企业在应对亚洲新挑战中的角色”等热点领域。与往年相比，本届上海论坛在上海自

贸区成立的背景下特设“自贸区特别专场：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将共谋自贸区未来的发展之路。在为期三天的会议和研讨中，与会代表将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以专业的视角就以上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力求集政、商、学界之大成，为亚洲和全球合作发展中的众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

上海论坛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新型高校智库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论坛发起于2005年，九年来，共有海内外政、商、学界精英领袖逾3000人次参会，论坛始终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为学界精英、政界领袖、业界翘楚的交流互动搭建平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与繁荣开拓新视野、贡献新力量，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号召力的国际性论坛。



上海论坛（2014）媒体拓展会

2014年7月4日下午，上海论坛拓展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701会议室召开。此次媒体拓展会的主题是对2014年上海论坛媒体合作的总结以及对2015年上海论坛的展望。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上海论坛秘书处秘书长、复旦大学校长外事顾问陈寅章，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萧思健，上海论坛常务副秘书长、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张怡等出席了会议，来自瞭望东方周刊、文汇报、解放日报、晨哨网、第一财经、国际金融报、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负责人也列席会议并参与了讨论。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对媒体对于复旦大学和上海论坛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了感谢。他指出，这十年来，上海论坛一直致力于战略和政策研究，一方面服务政府决策，一方面也聚焦于社会关注的热点，为国家和区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明年是上海论坛十周年，具有承上启下

的特殊意义，希望媒体朋友能出谋划策，为复旦和上海论坛今后更好的发展提供帮助。

各家媒体单位相关负责人随后就2015年发展趋势和主题预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双方就未来深入合作的方向达成意向。



新书发布：《Shanghai, Global Contender: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2014年5月，聚焦于上海建设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英文研究的专著《Shanghai, Global Contender: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在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发布。作为“上海论坛2014”学术系列产品之一，该书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和上海论坛共同编辑出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分为全英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有关上海自贸区的专题研究，下篇为有关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其中上篇分为四个独立的专题，分别为TTP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启迪；自贸区内银行离岸业务风险管理；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六大领域开放政策比较研究以及基于金融支持视角的提升上海自贸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研究。下篇分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研究，分别介绍了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香港及这六个中心的比较分析。接下来是关于国际金融中心专题系列研究，具体有：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二、民间金融向何处去？。三、《国际金融报》“金融中心启示录”三个专栏。

本书兼具理论研究与金融智库的特点，力图为建设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开幕式大会致辞



■ 杨玉良
中国复旦大学校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5月的约定始终依旧，上海论坛用9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聚焦海内外政治与经济热点的新天地，追溯过去，反思当下，聚力未来，这里为上海、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全面进步而贡献着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动力。今年的论坛主题定为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很巧的是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今年博鳌论坛的主题是“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这说明全世界的学者、政治家、企业家和媒体，对亚洲需要新的动力这个问题时有共识的。我们是用“identify”（寻找）这个词的，在我看来，“identify”（寻找）是在许多道路和模式当中，通过试错而甄别一条正确的道路。面对那些走不通的道路，我们都会感到焦虑，会担心未来将会怎样。人们期待亚洲突然获得发展瓶颈的新动力，但是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为了获取新动力，我们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可以与过去的发展模式告别，但在转型的迷雾中，我们真的可以安然找到一个万能的答案吗？这也正是改革的意义，改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犯错和改正错误当中才最终把事情做对。

在经济下行、社会矛盾、领土争端、民粹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如何迎接亚洲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推动亚洲各国联手建设资源互补的区域共同市场，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如何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求同存

异，为亚洲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这些问题需要与会的诸位来进行审慎的探讨。围绕“转型”这一主题词，本次论坛将分别就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与亚洲面临的新挑战、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亚太合作的新视野、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政策引导与优化、创新与智慧、变化中的亚洲劳动力市场、城市化的升级与城市的未来、环境与卫生系统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迈向包容性发展绿色能源转型与环境气候治理等重要议题开展广泛而深刻的探讨与交流。各位嘉宾本届上海论坛主题阐释中有这样的话语，亚洲实现和平、合作和发展不仅需要构建合作体系而且需要构建共同的价值，不仅需要创新新的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有效的行动议程。在全球治理日趋复杂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表达，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理解。而这些正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上海论坛努力为大家来创造的。

最后，真诚祝愿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在复旦大学，在上海，在中国获得最新的思想，交上最真的朋友，度过最好的时光，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自 从 2008 年之后，世界各地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危机，整个国际社会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但是现在就要宣布这些危机已经过去还为时过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这里，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讨论，为未来的发展寻找到新的动力。

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充满着转型和不确定性，特别是亚洲这样一个地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所谓的亚洲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之中，亚洲的经济发展非常的繁荣，而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紧张趋势却又非常的明显。除此之外们对于全球力量的转换也充满着一些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焦虑。这有可能带出一个新的冷战，但是和上一次冷战不同的一点在于中国和美国之间都有这样的意愿来采取新的措施，解决这样一个挑战。中国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即“新型大国关系”这恐怕是中国的一次尝试，以便能够重新地定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恐怕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女士们、先生们，今年的论坛主题就是亚洲转型：寻找新的动力，包括了亚洲未来发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这些主题当中亚洲的金融界似乎应该是亚洲未来发展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希望提醒大家回想一下 2012 年上海论坛的时候，IMF 的执行副总裁朱民先生所说的一段话。他雄辩地告诉我们说，亚洲地区的金融交易合亚洲巨量的区内贸易量相比显得惊人得低。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复活亚洲的金融产业，以便能和它在世界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相适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个地区的金融合作。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欧洲整合之后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在 50 年之后这 28 个欧洲国家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尽管欧盟现在仍然在试图摆脱欧元区的一些危机，并且面临一些未来的整合上的危机，但是我想欧洲能

够为亚洲的整合以及未来的整合提供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所谓的新动力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应该是这样的，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两句，那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迅速地发展，这会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同时来确保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城镇化这个问题和环境以及公共健康危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都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我希望相关的一些嘉宾讨论的环节能够深入地来挖掘这些问题，以便帮助我们很好地应对这些在城镇化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和韩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原来都是主要的外国援助的接受国，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贡献者。这仅仅是只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这两个国家应该相互合作，为国际社会带去共同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我也非常高兴地注意到本次论坛会有一个讨论的环节，主要是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讨论的领导者是 SK 集团。其实我们应该充分地强调企业和组织对于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在唐和清朝时代中国始终是文化和学术交流的世界中心，中国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繁荣，中国始终掌握着最珍贵的知识，同时非常愿意和它的近邻分享这些知识。为了追寻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传统，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多地通过建立自己的软实力来为整个国际社会作出持续的贡献。

有道是“十年磨一剑”，明年上海论坛即将迎来十周年，我相信未来上海论坛在引领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方面一定能够独领风骚、独占鳌头。

习近平主席在年轻时曾提到一句话，那就是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真诚期待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与复旦大学越走越亲，韩国与中国，亚洲与世界越走越近，全球合作越来越和谐。这是我们上海论坛的梦，谢谢！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韩升洙
韩国前总理

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变化调整之中，全球化势不可当，我们也知道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存度也已经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境遇和感受。毫无疑问，所有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都已经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受益匪浅，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随着全球化不断的向纵深推进，现在应该花些时间来重新思考亚洲如何从全球化中受益。无法否定亚洲的确成为了全球化的受益者，在过去的确如此，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亚洲，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助力于世界经济在快速调整并且不断向前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当中做出新的表率 and 贡献。为了更好地通过全球化的进程向世界做出贡献，亚洲必须实现转型，并且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本次上海论坛的选择是“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亚洲的 GDP 占世界 GDP 总值的 29%，并且我们预计这样一个比例到 2020 年会增长到 39%，到 2040 年会增长到 51%，据预测中国将在 2040 年占世界 GDP 的 23%，而印度占 16%，这样一种快速的增长只有在找到全亚洲增长新动力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和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

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当中，东北亚地区现在已经从战争和贫困的阴影当中崛起，成为了一个世界关键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心。从世界战争和满目疮痍的贫困状态当中不断的崛起，东北亚现在已经显然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的一端，中国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二大重要的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是世界第 14 大经济体。以上三个国家的总的 GDP 现在占到了全球 GDP 的 21.1%，到 2012 年已经占到了世界的 18.2%，这些国家属于五大技术创新国。另外两国是美国和德国。

与此同时，亚洲国家普遍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国，而

其中，中国的排放量是最大的。从 2011 年的数据统计来看，中国的排放总量已经达到了 87.15 亿吨，印度排名第 4，日本排名第 5，韩国排名第 8，所以我们未来所需要的不仅是一条经济增长的道路，更是一条绿色、洁净的道路。我们要的是社会包容性的增长，没有这样的转型和技术，没有这样一种清洁和包容的增长，我们的未来将是不可持续的。亚洲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亚洲的生产网络、制造网络现在更为多元化，更为分散化，而且技术的创新速度也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快。亚洲现在正在迅速地实现城市化，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并且正在向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迈进。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对于能源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以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来实现自己的能源供应，因此在未来的全球化时代它将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制约。

与此同时，经济同样也会受到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而这些关系也经常会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而在这方面，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非常令人遗憾，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令人受到鼓舞。如果东北亚地区没有办法实现长期和平的话，未来该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即，我们希望未来的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繁荣发展，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目标就是能够实现东北亚地区的持续、持久的和平，并且彼此之间要建立在互信、互谅的基础之上。抚平战争和历史的伤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和妥协，并在中国、日本、韩国之间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将是我们将该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进行引领的基础。东北亚地区为未来我们与日本的和解、两国之间的和平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例子。

当我们考虑到现在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我们就能够充分地了解到在这个地

区的学术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性，而上海论坛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上海论坛始终关注学术研究和智力交流之间最前沿的问题，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了。当初我们引领一个亚洲新世纪的到来，非常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上海论坛这一非常重要的舞台上，并进行智力的交流。尽管这个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这个地区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关注挑战。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考虑如何加强多边的合作，以便能够拓展地区的自由贸易，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其次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多边的智力架构，以便能够应对跨国界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水、能源以及食物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的重要问题。

最后我想再次祝贺上海论坛，能够再一次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和学术领域的合作平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相信在未来它能够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并继续积极的推动亚洲的知识界、学术界的合作。同时复旦大学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也会在未来继续为此做出贡献。希望本次会议能够顺利、成功的召开。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方军**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司副司长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复杂多变的问题和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战胜这些挑战，需要国家之间、人民之间彼此尊重，密切互动交流，合作共赢，形成命运共同体。大学必须顺势而为，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塑造国际未来关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校是人才汇集、思想激荡的场所，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作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高校需要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积极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交流。必须直面国际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发展全局性、前瞻性、预测性研究，为政府提供科学化的支持决策。主动发挥服务社会、推动人类发展进程的功能。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研究亚洲各国发展的经验和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对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亚洲的发展包括中国上海的发展有大量的经验需要我们从学术上进行总结、提炼，发展来日方长，必须具有可持续的强劲动力。面对不断出现的危机与挑战，需要我们从学术上进行反思，做出恰当的决策应对。其中已基本解决但未彻底解决的发展不足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但仍然严重存在的发展不当的问题，包括已经初露苗头，但很可能愈演愈烈的发展不稳的问题及上海论坛以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的主题活动，希望借助上海论坛这片学术高地，广纳谏言，推动亚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迈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发展和崛起对于未来全球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亚洲的美好发展前景不仅需要亚洲各国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协力，更需要专家学者们凝聚亚洲智慧，攻克难题，

广开思路，我们坚信上海论坛一定能在差异中追寻共存，在多元中创造和谐。

教育部一直倡导各所大学以学术为基础，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各种平台和渠道促进跨学界、跨领域、跨文明的互动交流与沟通合作，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姿态服务于大局，服务于世界，服务于未来，为共同建设繁荣和谐的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百年以来复旦大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他们为实现中国崛起，为推动亚洲的社会进步贡献人类发展文明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希望人才济济的上海论坛能够汇合、溶聚出精彩的理念和观点，真正发挥一流智库、一流平台的积极效应，成为中国高校请进来的典范代表。成为中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交流的展示窗口，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中国高校能够积极参与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把握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宝贵的机遇。

上海论坛以相对集中的议题，自由开放地探讨亚洲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挑战，我们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们，能够在经济金融、政治法律、城市社会、环境能源和圆桌会议五大模块中畅所欲言，增进情意，在不同看法、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交锋与碰撞中形成发展合力，达成多赢共识。各位精英与领袖的卓越远见和集思广益，都将为上海、中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未来发展与进步提供无尽的智慧和可能。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屠光绍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05年，欣逢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佳时，由复旦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举办的上海论坛于五月应运而生。九年光阴荏苒，上海论坛始终秉承“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的宗旨，立足上海，聚焦中国，关注亚洲，放眼世界，围绕着区域经济、金融贸易、国际关系、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热点议题，汇聚世界范围内的学界、政界、商界精英领袖，开展对话交锋，凝聚思想精髓，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建言献策，成为亚洲国家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九年岁月积淀，复旦大学亦借由上海论坛这样高水平的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高校智库在政策建议以及决策咨询方面的作用，真正实现高校智库咨政启民的建设目标。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发展格局以及全球举步维艰的复苏进程之下，2014年的上海论坛以“亚洲转型：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为主题，恰逢其时。一方面，亚洲肩负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与往来，将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以及地区的深化合作创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任务和挑战，亚洲只有将转型与创新作为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才有可能在未来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从而实现亚洲的追赶与超越。

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科学发展的先行者，在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推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结构转型，有着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始终保持着高速健康的发展状态，即使直面今年一季度国际国内经济整体下滑的巨大压力，上海的发展态势一如既往的平稳，保持了7%的增长，实现良好的开局。在这个7%的背后，是上海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是“调”、“赶”、

“创”三足鼎立的强力支撑：

“调”，即调结构、转方式。近几年，上海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牢牢抓住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得服务经济的增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同时在制造业的增长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又快于一般的制造业增长，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赶”，即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近一两年，上海紧紧抓住“营改增”的改革契机，积极推进服务业发展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大力增强市场活力。同时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不断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持续释放经济平稳增长的动力。

“创”，即创新。上海准确把握“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题导向，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市场和企业的自主创新，新型经济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在上海不断涌现，发展势头良好，成为上海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助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上海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保持上海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任务依然艰巨，寻找新的动力势在必行，而这个动力必将肇始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创新，必须从深化改革当中要动力，要从扩大开放当中要资源，要从创新当中要能量。2013年9月底启动的上海自贸区建设正体现了上海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加快创新的理念和追求。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聚焦点”，具有至关重要的先导性作用。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上海在建设自贸区的过程当中，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以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关键是要激发市场活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路径是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任务是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经过将近八个月的建设，上海自贸区在以下

几个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推动：

第一，加快投资领域的改革。加快投资领域的改革主要聚焦于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去年，上海推出了2013年版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推出对于自贸区的制度建设，特别在投资领域的便利化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在原有“长”清单的基础上，2014年的负面清单篇幅可能缩短为2013年版的三分之一，而政策的透明度将进一步提高。

第二，加快推动贸易的便利化改革进程，使得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便利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加快金融制度的改革。围绕自贸区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自贸区建设启动之后，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人民银行和三个监管部门业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框架，有关细则和具体操作办法亦开始陆续发布。这些金融制度改革将对自贸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

第四，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形成。自贸区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以增强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仍需要政府发挥好自身的管理职能。而政府做好管理主要体现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完善制度。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企业年报的发布制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的等六大方面的内容。经过不懈努力，上海自贸区建设已颇有成效，然而从国家战略高度而言，其建设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惟其如此，2014上海论坛承担着为上海下一步发展拓宽改革思路，形成改革举措，推进成果落地的重大责任，同时亦肩负着推动上海自贸区制度建设，全面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为亚洲发展转型提供更多动力和能量的重要使命。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一、亚洲的未来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针对亚洲的未来和亚洲的创新这一主题，所能够做出的评论将同样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目前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增长均得益于他们在金融创新领域和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所作的努力。然而为了找寻新的动力，有如下几个方面仍需关注。

1、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亚洲各国非常好地应对了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段持续的增长期，很好地度过了这场危机。作为应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回升。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和政府吸引融资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起到了很好的经济平稳复苏的作用。

但长远来看，其中的一些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将会达到所谓的饱和点。因此，为了未来长远的发展，亚洲的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这一增长点将出现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并非宏观总体上的经济建设或是普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2、金融建设的目标

金融建设需要长期有效的机制，而非短期实现目标的手段。金融需要一种能够寻求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有效关系和平衡的机制，而这样一种机制必须在过去几百年当中，乃至未来的几百年中对于人类的社会有所规范。

因此，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3、消除对金融的偏见

由于金融使成本和利益跃然纸上，因此普遍存在一种偏见。许多人将金融视为赌博，这是人们最为根深蒂固的概念之一。这种概念导致目前对金融的评论以负面居多，进而阻碍了金融进步。而此类偏见的存在也有一定的理由。

1) 金融市场的难以预测性

图为1871~2013年美国的股价走势。蓝线是实际股价。而如果人们能够对于未来进行正确预判，股价将呈现出红线所示的发展情况，并不会出现蓝线这种程度的波动。一个是事后的理性股价，一个是实际股价，两者之间的差距（绿线的距离）就是我们所需要遵循的市场规律。过去的几年中，实际股价与作为完美预期的红线大相径庭。据此可知，金融市场的难以预测性。

2) 金融交易中确实存在赌博的心态

以短线交易员每天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例，几乎没有任何交易员表示可以从交易中获得显著的毛利润。因此必须承认，在金融交易中，所谓的赌博的心态确实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防止金融滋生腐败

金融机构被普遍认为是滋生腐败的摇篮。因此，金融机构需要来自政府的监管和行业内部的监管。上述监管本身需要大量的投入。限于各国人均GDP的水平，监

管的成本并非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微不足道数额。发达国家普遍对于新的监管措施开展了许多成本有效性的分析和大量的研究，英国、美国均是如此。

5、金融衍生行业

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对律师的大量需求。目前中国的律师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并非所有的律师都能够给予金融监管和反腐败方面的建议和指导。从业律师的数量有待提升。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金融咨询行业。大多数人不了解金融体系，以及金融顾问的重要性。政府应该对于公共金融建设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指导，以促成金融顾问和咨询行业的发展。

二、亚洲的创新

中国理应成为金融创新推进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在金融创新方面的新的动作、做法以及对互联网金融这种对未来起到重塑作用的力量，必须加以考虑。目前金融创新有如下这些形式：

1、刺激贷款

作为金融创新的一种形式，刺激贷款使信用评价不高的人，获得所需要的贷款。在一个非常活跃的经济体当中，刺激贷款的处置也有非常活跃的渠道。此外还存在影子银行。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正处在灰色地带中，但必须在未来找到一条正确、合适的道路才会有更好发展。

2、众筹

众筹网站使得每个个体能够以公司的形式开展投资，其目标是提供小额信贷和小额金融资产借贷。世界银行在报告中也肯定了众筹未来的发展潜力，并指出众筹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3、慈善税收

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当中，有少数人会掌握绝大多数的财富。这时一个必须被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了这些钱干什么？目前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财富最终应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未来。中国未来也面临这一问题。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回馈，税收制度亟待改革，例如将以慈善捐款与个人的所得税相抵。目前中国对于此类捐款的种类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若要鼓励个人捐款，应采取相应改革。

4、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金融改革的新方向。其核心为——在金融研究中加入心理学的考虑，因为人不是机器，不是计算

机，人有感觉、有崇高的目标和内在的心理活动。所谓人的概念泛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亚洲人。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改善金融系统的功能性，让金融系统更多地与人进行互动，以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

三、寻找新动力

寻找新的动力意味着首先得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然后自然地产生错误。在这个过程中，规则的漏洞会被一些人利用。但漏洞被发现之后，就需要对这些漏洞进行填补，并进一步进行完善。因此，试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只有通过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试错，才能加快这个进程，并最终寻找到新的动力。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亚洲的未来和创新寻找新的动力！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Adam Pos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今天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技术发展放缓的时代，这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公认。大量创新仍然在各领域不断涌现，而这里强调的是创新的重要性。投资者们认为，技术发展是一波一波出现的，在一次显著的技术进步之后，新型技术会被经济系统所接受并迅速反映出来，从而带来经济发展的飞跃。

在技术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第一，很多前沿国家对下一波技术浪潮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科技是外向型的，科学家不可能总是有新的发明，新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轻易产生。

第二，在北美的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情况形势严峻。目前，为了对潜在金融危机做好充分准备，西欧以及美国的部分公司持有大量的资金。即使现在美国的经济有所回升，利率水平较低，但是很多企业却缺乏投资积极性，新的投资周期并没有出现。原因之一就是潜在效益大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少。这并不是指现在的技术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说3D打印和基因学上的成果进展，这些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发展放缓的现状对中国、美国，以及不断新兴的亚洲的具体影响。

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体，一种是前沿国家，即第一集团，这些国家往往在技术创新上不断推动前沿发展；另一种是追赶型国家，比如中国，他们有能力向第一集团进发，但是目前还处在调整期，需要学习各种技术并应用到全国各地。在现实世界中还有第三种，即较为落后的国家。这种模型应用了机构政治经济学的理念。

在这个模型中，如果前沿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就会相对较快。因此，前沿国家和追赶型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追赶型国家可以应用已有的技术进行发展，而前沿国家在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知识产权会越来越难得到保护，技术创新的脚步也会放缓，这又会促进而追赶型国家占有相对更多资源进行发展。我们很难去评判这种现象的优劣。知识产权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却阻碍创新。因此，我们需要额外

措施来实现平衡和整合，在不妨碍创新的前提下充分保障知识产权。

那么，前沿国家发展速度放缓，追赶型国家发展速度上升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于前沿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也会加大，而其对于经济发展却起着重大作用。

对于追赶型国家来说，资本流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投资组合应能体现出当地的发展前景。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协调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比如，部分西方公司会把它们的研发厂家和高端生产模式实行到国外。一些理性的投资方可能乐于看到这种情况，但是这里面也涉及到利益方面的冲突。

第二，大量资金从前沿国家流出，并进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同时，也会带去知识和技术，而这也触犯到某些利益集团，损害它们的利益。

第三，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的全球化影响不容小觑。过去的40年，巴西、中国、印度，以及东欧等地，在没有牺牲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从原来的贫困发展到现在已有不少人进入中产阶级，这就是全球化的影响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各种影响因素不断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认真对待政策因素。作为投资者，要考虑接下来几年世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走向，其中牵涉到的范围很广，比如美国利率方面的变化。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任何变化都牵动着世界经济，两者发展也呈现出一致化的趋势。

技术发展放缓所施加的另一个压力来自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其中涉及到自由贸易的发展问题，这也需要各机构、组织的共同合作。社会转型不仅需要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西欧、美国还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内结构性改革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在中国尤其有适用价值。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
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
《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主办方要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作《星球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将有助于推进亚洲转型和寻找新动力。

我将为此次会议带来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能源及相关环境影响对亚洲发展造成的挑战；其次是洞察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结构作；最后是将危机化作解决问题的机遇。

风险

国际燃料市场，尤其是国际燃油市场，一直都在波动，而且这种波动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大战之后，油价波动性猛然加剧而且难以预测，但实际上，除亚洲外的全球石油需求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而自石油危机之后，油价与经济增长间的关联性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再来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它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我们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无需赘言。而这些风险范围有多大，要考虑多大的变化，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对如何防范全球性风险才我们考虑的关键。这些问题包括：就市场而言对GDP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去衡量GDP等；以及对于社会稳定性等非市场的影响。如果把这些因素全包括进来，影响就越来越难以量化，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会令人悲观。

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吗？到底气候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评估、协调？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市场失灵”，还有人称之为“道德的完美风暴”。但在目前，我们确实做得还不是很好，你可以看碳排放在过去的十年的排放量甚至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都要多。而有些本是地方性的排放扩到了地区，进而影响到了全球。

洞察

要真正地理解问题背后的经济结构，我可以为大家作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事实上，能源消费与GDP的比值基本上是稳定的，有些国家或许会因为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在能源的效率方面加强监管，并且会在能源创新和供应等方面下很大功夫。

从经济学对此类问题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

个所谓的最佳实践前沿，让市场参与者之间有互相连接的良好动力和积极的探索力。

就市场而言，如果它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要对价格进行指导或约束，必须开展大量战略性的重点投资，必须着眼于长远的回报，把创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所作的分析都是发生在宏观经济学的层面上，一个经典的经济学增长模式一般都是基于所谓的存量，也就基于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资本和资源的累积效应的研究得出。许多经济学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回答和这个理论相关的许多问题，他们主要的研究是在两大领域，其中一大领域就是如何把经济与技术的发展驱动力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政策、法律以及在机制和文化等层面获得一个更好的解释。

机遇

最后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风险以及发展机遇。我们来看一下能源体系，其中对于发展的驱动力、环境以及包括能效在内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极其复杂，这些因素都是基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发展方法，而不能让意识和解决方法脱节。看过了亚洲快速增长的驱动力和轨道，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更为一体化、更为整合式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是思考方法呢？

对我们来说发展的机遇来自于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激进的创新的方法，同时更好地理解相关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并在不断发展中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找到具体的印证。到本世纪中叶，全球GDP和全球迁移之间的关系将会非常微弱，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创新和GDP增长的内生驱动力与全球迁徙化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未来世界要变得更为企稳，那么把极不稳定的要素加以去除的话，唯一走的路就是创新。所以我们现在最大问题不是增长动力不足，而是接下来要面对的结构性和系统性调整的步速以及方向把握的问题。未来的方向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这个关键选择的决出，有赖于大家。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引言

几年前，亚洲经济飞速发展，全世界为之欢欣鼓舞！很多人由此断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无疑是其中备受瞩目的焦点。然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人们对所谓亚洲世纪说的热情似乎也在消减，开始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转向亚洲经济体中脆弱的一面。

但是，我对时下怀疑中国和亚洲的观点并不认同。

原因有二：第一，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逐步走出，这无疑会重新激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外贸发展的动力。第二，亚洲经济体有着很强的韧性，经济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也促使各国政府反思其政策上的缺陷，并重视其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二、亚洲的挑战

但这并不表示亚洲经济发展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在发展进程中仍面临着不少障碍，需要整个地区通过积极的转型来克服。

挑战之一：传统制造业亟待升级。亚洲经济体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制造业来驱动增长。然而，与日俱增的要素成本会逐渐侵蚀中国等亚洲国家产品的竞争力，这些国家迫切地需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使制造业能够升级到依靠创新来驱动，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力得到更好的提升。

挑战之二：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改善。过去的二十年中，全球GDP翻了一翻。但是，与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相伴而来的是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在环境问题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亚洲也不例外。目前，这一地区在生物多样性、生态恶化和土地退化等方面形势严峻，全球很多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也都地处亚洲。

挑战之三：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如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这一问题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更是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收入的不平等

也会带来机会的不均等，时至今日，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亚洲居民等不到安全的饮用水，营养情况也亟待改善。

三、解决之道

上述的挑战告诉我们，亚洲的崛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转型和发展的进程中必将几经波折。当然，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亚洲已然向世界证明了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因此，我对中国和亚洲克服挑战、顺利实现转型的前景，总体持乐观态度。

解决办法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目前转型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其技术水平，继而升级其制造业。亚洲经济体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若想实现继续增长，必须充分激活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力量，在技术上从追赶者转变为领导者。

解决办法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我们亟需发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其主旨就是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资源利用效率得不到提升，未来的各国将在解决由能源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上消耗更多的精力。如今，一场关于可持续性的革命已经不再可有可无，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解决办法三：包容性增长克服不平等问题

亚洲国家的增长必须强调其包容性，这并不是单纯的减少贫困，而是要更加关注平等问题，包括准入平等和机会平等。为此，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入，通过有效的政策来为低收入弱势群体带来切实的福祉。

四、结束语

亚洲各国需要积极寻求转型，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惟有如此，21世纪才能真正成为亚洲的世纪。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闭幕式大会演讲



■ 金范中

韩国海洋水产开发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去年9月29日，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政府为促进贸易、投资增长而在试验区推行的体制改革政策。上海自贸区涵盖了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占地29平方公里，我认为它的规模还是过小，而且上海自贸区和其它世界自贸区相比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正式注册和登记后，所有的商业往来不能在园区以外的其它地方运行。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韩国的特别经济区的相关历史和特点。起初，为了进一步促进收支平衡，韩国政府在临海地区设立了一些特别出口加工区。1970年，马山港建立了第一个自由出口加工区，并在2000年更名为自由贸易区。为了改善物流和商贸的政策环境，2002年釜山港、光阳港和2003年的仁川国际机场相继被确立为自由关税区，如各位所知，这几个地区都可享受关税免征。2003年，为了发挥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同效应，韩国政府将一系列以制造业和物流业为导向的自由关税区整合成了自由贸易区，这些举措令韩国的港口、空港跻身于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枢纽港。2002年我们推出了自由经济区的概念以吸引外资并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并将仁川、釜山、镇海等地作为试点着力为外商投资者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商贸投资环境，这些地区的建制类似于特别行政区。此外，为了给外商投资者提供宜人的居住环境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除制造、物流外，这些地区还

兼具居住、医疗、教育、旅游等功能。截至当前，韩国共有13个自由贸易区，8个自由经济区，包括釜山港和光阳港以及仁川港在内的主要港口都可同时归入不同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经济区。

目前，世界上约有60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贸区功能大抵相同也各具优势，比如阿联酋、美国、荷兰、新加坡等国的自贸区成功的经验基本上在于关税减免、生产制造、物流仓储、转口贸易等方面，而韩国的自贸区可以为外商投资者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样的，上海自贸区也强调贸易增长以及吸引外商投资。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上海自贸区也正不断致力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和提升商贸服务开放性。

我认为自由贸易区成功的关键在于：首先，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同时对相关商业活动行使治外法权的保护；第二，自由贸易区需要有一个完善配套的法制保障体系；第三，自由贸易区管理机构必须要具有非常强大的管理能力；第四，每个自贸区必须要推出具有特色的优惠政策，如服务业、外汇交易、共享信息等能够令外商投资、交易便利化的支持举措。同时自贸区在海关监督管理方面也应该有更为快捷、方便的方案。

祝上海自贸区未来更加美好。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邱丽萍
中国香港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研究
副总监



各位上午好，很高兴来到上海论坛并参加本次自贸区特别专场讨论。

首先，自贸区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给定或指定的一片区域中，投资、贸易和商业往来都是自由的。设立一个自贸区的目标是为了能够促进商业活动，并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所以，对于香港而言，整个香港都是自贸区，同时因为我们属于中国，香港也可视作整个中国的自贸区。而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也是非同寻常的。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自贸区，除了不用缴纳任何关税，外资公司还可自由在港设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可拥有公司 100% 的所有权，并且还可以自由地将利润输回国内。但最重要的是，香港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独立关境。同时作为贸易和服务门户，香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这里不仅可以联接整个区域，而且还能联通整个世界。我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就贸易而言，香港在全球出口量的排名为第九，这就意味着有很多的企业其实是把货物先运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再中转到其他地方。而且我们是世界第三大 FDI 目的地和第二大投资输出地。

同时我们也知道，香港是一个枢纽，许多公司都在这里设立总部，然后把投资输送到世界各地。香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我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纵观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现在世界生产贸易和投资都在一个所谓的全球价值链中高度的整合和组织规划。起初，这一趋势只是表现为将生产分化到全球各地，而近年来包括研发、营销等价值链中的服务环节也明显呈现出的全球化的态势。而香港作为一个贸易枢纽，可以为这些公司管理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提供极佳的平台，我想以纺织、服装和鞋帽这一行业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近几年来，中国已不仅是服装和纺织品的生产地，而且还成为了设计和营销基地。所以除了有

OEM 以外，我们也开始更多地从事 ODM。因为对于 OEM 来说，所有的品牌、设计都是来自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但在 ODM 方面，中国的制造商也开始接手一些像设计这样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尽管过去几年中国已在纺织纤维生产和制造的价值链中有了很大的能级提升，但我们仍然需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例如印度的棉花、澳大利亚的羊毛，台湾和韩国的高级面料等。过去几年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可能更加愿意把生产制造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以扩大生产分散化的优势。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

香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枢纽性的作用，我们可以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支持，帮助在香港的贸易公司很好地管理他们散布在各地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服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粘合剂，它可以把供应链中的每个环节进行高度的整合与汇总。由于供应链分散在不同地区，许多跨国公司都必须能协调、整合这些复杂的供应链以缩短交货周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公司都要管理许多不同的供应链，如何协调使其高效迅速地来响应客户需求非常关键。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管理供应链，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那些跨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许多跨国企业都将香港作为管理亚洲供应链的基地。原因就在于香港极佳的商业环境、很低的税率和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此外，我们还有完善的法制、经济自由和一流的基础设施，在这里更可便捷地联通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地。此外，香港的服务业聚集更可令企业高效有效地管理供应链，在香港可以自由灵活地开发创新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

谢谢。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校长



大家好。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鹿特丹的案例，这些案例或许会和我们之前讨论的例子有所不同，我的发言集结了我在鹿特丹大学商学院的同事的贡献，他们做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研究并且了解一个港口取得成功、高效运转需要哪些因素。

自由贸易区在欧洲并不那么的流行，尽管过去欧洲确实有很多成功的自由贸易区，但是现在很多自由贸易区都已被撤除。即使像安特卫普这样的自由贸易区也已关闭。欧洲的自由贸易区之所以不复流行，是因为随着法律的不断严格化，我们需要对物品流通进行严格的控制、管制，同时整个欧盟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了自由贸易区，当然，这些只有当你生活在欧洲内部才能感受到，如果你是非洲的农户，想要将农产品运到欧洲，确实还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目前在欧洲我们关注得更多的是新的创新，比如说对海关管理机制，以及运输过程当中的安全、安保等。这都是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要素，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不同贸易区之间的战略连接性。我希望站在鹿特丹这个历史大港，告诉大家我们是如何考虑这些战略性因素的，也希望能够为中国提供一些具体的经验。

多年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了解到鹿特丹港是当时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但现在世界增长最快的十大港口主要都分布在中国了，第一到第八大港都在中国，第九大港在新加坡，之后才是鹿特丹，所以鹿特丹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但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并非仅仅是由量决定的，质与量同样重要。如果关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你就会发现除了硬件之外，软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2013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荷兰排在第8位，中国位居第29位，要知道荷兰只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论人口规模比上海大不了多少。但是就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它的竞争力可以排到世界第八位。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它的世界竞争力？港口的基础设施以及这些设施的质量本身，对于荷兰而言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港口对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能做些什么样的贡献，而政府又

该如何维持和推动这种竞争力的发展？这种战略连接性是如何提升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又会有怎样的作用？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给出一些建议，首先应该增强上海港内的互联互通性，然后加强中国各个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进而提升中国港口和世界各主要大港的互联互通性。而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提升这种互联互通性。政府有两种基本的手段可以提升这种互联互通性，一种是投资，另一种便是法律法规。荷兰政府对于港口的投资是不遗余力的，而就法律归管而言，我们则致力于改进税收和相关的监管制度。举个例子，2007年荷兰政府推出了一个AEO证书，这有点像一种自助机制，一旦你获得认证之后，相关的政府机构对你的管制就会减少。在国际贸易当中，如果你受到的管控较少的话，就可省去很多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像香港一样，我们可以对整个价值链、供应链进行认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使鹿特丹和其他的港口有效连接，因为你可以将你的供应链进行认证，这类认证完成之后，港口和港口之间的互联互通性就会得以提升。

接下来大家可能会考虑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自2011年起，在鹿特丹和上海之间出现了一个智能贸易路径连接系统，所以我认为自由贸易区的作用不仅限于自由贸易区本身，它不仅能提升上海这样一个港口的战略价值，同时也能提升中国的战略价值。此外，研究人员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把上海和鹿特丹这两个姐妹港进行连接，或许这听上去像老调重弹。但实际上对一个国家而言，竞争力确实由一些主要的因素决定，这些因素也可应用于企业和地区。除了硬件之外，我们知道一些软性的东西，包括像一些支柱性产业，支持性的政策环境等等也非常重要。同时加速创新也至关重要。做到了这几点后，我们可以同时提升上海和鹿特丹的竞争优势，两个姐妹城市也将携手共进。谢谢。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简大年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管委会副主任



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的自由贸易区，至少是形似神不似。所谓形似，即它也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划出了一块区域，某种程度上有传统的物理围网，而且有一个规范的面积。所谓神不似，是其本质还不是，在这个园区当中它的物流功能、集散功能的提高，自身产业的发展，或者一般的看待这个园区本身贸易便利化环境的改善。它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创新的试验田。所以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这个自贸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它的关键是我们坚持制度创新。自贸区是政府职能改革的一块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自贸区的成功是制度创新，自贸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制度创新。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自9月29日揭牌到现在大概7个月左右的时间，管委会一直都很忙碌，我们一直忙于接待企业、领导和媒体。目前，到自贸区来咨询、访问、登记的人数已超过了20万。在这期间入驻到自贸区的企业达到了九千家，特别是外资企业进入自贸区的比例已经由原来的4%左右上升到了10%，而且它的幅度仍在增加。我认为与其说这七个月来有成千上百的企业和个人到自贸区来咨询和注册，不如说中国（上海）自贸区作为一根导火线点燃了积累在社会企业和个人心中的渴望多年的期盼改革和开放的热情；与其说自贸区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万五千家企业和即将入驻的企业在等待着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和操作细则，不如说自贸区作为一支催化剂激发了我们企业社会 and 个人的创新激情和创业的活力和空间。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并没有等到优惠政策，而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和环境当中，企业提出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其说是自贸试验区推出了第一份负面清

单，不如说这个负面清单的表面的意义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告诉我们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与其说负面清单是一种投资的目录，不如说负面清单正在成为我们政府改革的一个管理方式、管理思维；与其说上海的自贸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在大胆试，在自主改，还不如说它毕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焦点。使得国家特别是国务院的几十个部委办在几个月内提出了几百条的改革措施，这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作为一种改革的推进器，形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特别是政府职能改革的一个氛围，一种环境。这是上海自贸区的真正价值，这种价值高于吞吐量，高于一般的转口能力。

我认为制度创新的核心和要害有两条：

第一，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国际通行规则的推出，要在自贸区对于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形成一个很好的试验结果，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第二，通过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政府的改革。这个政府改革的要害就是让政府从原来重审批环节过渡到今后政府重监管环节，这是整个自贸区制度创新的重要元素。

到目前为止，整个自贸区的建设仍然坚持着党中央、国务院交代的三大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核心的准入放宽，在此过程中自贸区正在建立一个包括安全审查制度、反垄断审查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信息共享、联动执法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市场全过程监督这六项制度的事中、事后的管理内容。第二个任务就是服务业的升级和扩大开放，自贸试验区在整个试验当中，超越了我国对 WTO 承诺开放的领域，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六个领域的 18 个行业推出了 23 项开放措施，虽然这 23 项开放措施还比较少，但是目前的整体推进还比较顺利。第三个任务是在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方面。自贸区现在还是在围绕着投融资汇率便利化，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改革进行第三方面的改革。而“金融体制先行先试”的核心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是为了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流通的规模，利率市场化是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人民币价格形成的定价机制，外汇管理改革是为了提高人民币与外币兑换的便利程度。特别是 5 月 22 号推出的自由贸易账户规则和细则，它是在一个新的账户体系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综合环境。

最后，我认为自贸区实现制度创新以及成功的关键有五条：第一，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和整个政府的简政放权结合起来；第二，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企业的用户体验结合起来，第三，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国际规则结合起来；第四，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上海的“四个中心”建设结合起来；第五，制度创新必须更好地与我们自贸区的可持续、可服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自贸区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自贸区。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纵观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史，欧洲自由贸易区可追溯到德国北部的自由城市，早在公元十二世纪，汉堡和吕贝克等地便已出现推动手工业发展的贸易。而与此同时，在贵族专制的欧洲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往往都是通过武力和吞并来促进贸易。

不同于这些国家，城邦的商界领袖则是通过创建自由港或与其它城邦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一个横跨欧洲的通商网络：这便是早期共同市场甚至是 TPP 的一个原型。因此，当今的贸易自由化与历史上的自由港是有许多相通之处。

由于针对自由贸易区的学术研究非常少见，我们实际上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在这方面，意大利学者 Francesca Trampus 博士以及世界银行的报告给了我们许多启示。譬如，世行放出的一条最新消息便主张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建设自由贸易区。他们也强调自由贸易区正在发生变革。而我想探讨的正是自由贸易区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变革，因为，这一主题与上海息息相关。

自由贸易区的优厚条件是政府决定的，所以自由贸易区要想成功就必须要有周密的政策设计、监督管理以及准备好吸取教训、亡羊补牢的心态。在这里，我要向上海致敬，因为在当下改变就是成功的信号。

我们在迪拜成立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并非巧合。因为迪拜从来都是自由贸易区创新变革的样板。对此，Easterling 教授更是将包括国家的、非国家的、军事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种种力量归结为推进创新变革的增益要略。如此看

来，迪拜的自由贸易区是一个贸易、金融、管理和交通枢纽。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自由贸易区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6 世纪中叶到上世纪 30 年代，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自由港和早期的自由贸易区；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主要的表现是出口加工贸易区；而第三个阶段则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特别经济贸易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学产业园区的崛起。

在当今世界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新事物，包括像园区城市。自 1985 年迪拜建立 Jebel Ali 自由贸易区以来，迪拜的自由贸易区已变得无所不包。各种各样区域活动远远超出了转口贸易的范畴。

上海也是如此，就在上个月，这里新成立了一个仲裁法庭。在前天的开幕式上，Shiller 教授也谈到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律师。或许，上海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不过他们觉得请仲裁员要比律师更加经济高效。总之，上海正在为自由贸易区牵线搭桥使其成长、壮大。





未来的发展方向何在？转变又何去何从？这些转向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城市，这使我想起了 Benjamin Barber 的《假如市长统治了世界》，此书还有一个颇为引人的副标题，叫做“国破，城立”。上海自贸区全称中有“试验”一词，这让我很欣慰。因为，这说明这片区域并非上海独享的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这里的成功经验将要复制到其他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举措，因为它化解了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一大政治挑战，即园区边界和园区内的优惠政策。据我所知，此类难题已经困扰欧洲多年，因为在欧洲，许多的自由贸易区福利都被视作国家援助、专享特权的同時也被欧盟限制，这就会令自贸区丧失潜力。而在我看来，“试验”这一概念正好化解了这一难题。因为如果一个区域内的试验在时机成熟后会推广到全国，那么这片区域获得的利益尽管会令其他地区羡慕却也合法化了。但是，之前不公平的特殊待遇若不能在恰当时机扩展到所有地区，那么就不能同一而论了。

第二个让我感到高兴的就是试验区提出的试验性概念。比如，负面清单就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因为我认为我们应当意识到法律的制定不会总是一步到位。正确的答案也不总是仅有一个。

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上周在考察上海自贸区的时候也提到，上海作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区需要周密的管理，要结合体制改革和新的思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不断进步。

最后我想概括为三点：一、自由贸易区不能成为特权的飞地，而应是试验田；二、自由贸易区要为整个经济体服务；三、自由贸易区已突破旧有的功能范畴而转变为具有了广泛意义上的经济社会作用的园区城市，从而对国家、社会具有非凡的影响。因此，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功势必将会是举世瞩目的，因为它将引领今后全球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闭幕式大会致辞



■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尊敬的朱之文主任、杨校长、林尚立副校长，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上午，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上海论坛已渐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学术中心，在这里亚洲和世界可以进行积极的对话和交流。通过为中国、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提供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来交换意见、共同讨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我们得以在专业悲观和谨慎乐观之间达成共识。

过去的三天里，在九个专题之下开展了很多的会议，同时我们还举办了高端对话、圆桌会议，讨论了亚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所面对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我相信这些分论坛的讨论和会议让大家认识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尽管亚洲的经济增长迅速，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亚洲仍然有占世界 60% 的穷人，同时我们的社会不平等也在不断上升。很多的亚洲国家还须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因为老龄化会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就业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尽管亚洲各国间经济上相互的依靠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不断激化，各国在系统性的合作，尤其是贸易和金融合作方面接连受挫。

如果让我总结一下这个地区的现状，我想说这是“伟大的转型中的不确定性”，正如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在开幕式中所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快速增长，还应当是快速而清洁的增长。我们也需要社会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如果没有转型和新技术，我们是就无法实现这种包容性的清洁增长。”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不仅仅困扰着一两个国家，而是整个国际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在寻找新的动力方面，我们要特别关注可持续性、合作、创新及企业家精神，我们应该不

断的鼓励综合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要鼓励政府、学界以及私营部门加强研究合作。科技创新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通过打破成规，化解由来已久的国际危机，这样的创新可为人类的发展寻找新的道路。

在此我想呼吁各大院校、智库、民间组织不断发现、共享新的知识、使之成为创新的催化剂。而 MOOC 等大型网络公开课程则向我们预示着一个以数字多媒体推动创新的新时代的到来。我也希望上海论坛能够受此鼓舞，通过数字媒体在网络上将这些创新的理念和知识产权等与世界分享。通过数字媒体，我们能够消除距离，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使上海论坛进一步助力于国际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我之前在开幕式中曾经简要地提及一个由 SK 集团主持的社会企业特别讨论会。该会议聚焦如何推动跨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目标是使企业家联合起来共同克服这一地区中存在的平等加剧等社会问题。这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会议相当成功，我们也希望这一会议能在今后的上海论坛越办越好。

最后我还要非常感谢朱之文书记、杨玉良校长，我认为上海论坛的组织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我还想感谢我们的林尚立副校长以及所有的组委会和秘书处的同事。与此同时，我还想向刚刚去世的我们基金会的一位同事先生表示哀悼，他于上周突然因病辞世，但是我们对他在过去八年当中为上海论坛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是中国的名门学府，长期以来一直继承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优秀传统，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离不开复旦大学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复旦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辉煌！谢谢！

（根据速记稿整理摘录）

上海论坛（2014）期间，组委会邀请复旦大学知名教授对论坛开、闭幕式演讲嘉宾进行专访，听取他们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洞见，及对亚洲发展的思考。

VIP
访谈

关于“泡沫”的争论与世界经济中的泡沫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采访者：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编辑：Johan Gade，魏晓岑



张军：去年您和尤金·法玛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您是泡沫理论的创造者而法玛则认为金融市场中不存在“泡沫”的概念，您认为诺奖为何会授予你们两位观点相互抵触的经济学家呢？这意味着什么？当你得知你和法玛同时得奖有没有感到吃惊？

Robert J. Shiller：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评奖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但他们曾经这样做过。197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两个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缪达尔。哈耶克的思想与法玛有点相似，他甚至比法玛更极端——强调自由市场。而缪达尔更强调人民福祉，他认为让贫困人民继续受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从道义上讲我们必须将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我认为委员会的想法是，这种争论本身就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答案。短时间内没有人能回答自由市场假说到底成不成立的问题，但听到人们讨论这一问题总是好的。委员会为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提供在斯德哥尔摩免费待上一周的机会，并且可以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在这一周中，我和法玛有了很多聊天的机会。在我们一对一谈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隔阂。我们都同意股票市场是可预测的，尤其是长期的走势而不是明天股票市场会怎么样。只是我们两个对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看法。他并不喜欢“泡沫”这个词，而我创造了泡沫的另一种定义。“泡沫”这个词是在 1720 年之后才开始明显流行起来。当时欧洲的国际股票市场出现了巨大震动。没有人知道“泡沫”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它就那样流行起来。我们认为泡沫就是非理性的投资者主导市场，并且价格升得过高。我喜欢把它称为一种社会潮流，就像我们在其他领域中看到的潮流一样，比如服装界。例如，在 1960 年左右人们都开始穿蓝色的裤子，并且它一定得是蓝的！人们跟随社会潮流，这是一种人类的本性。在股市的泡沫中，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都会去买股票。

他们给你一些听起来合理的理由，经常是一些新的故事，但你要意识到这些故事通常是应股市的发展而编出来的，而非有根据的故事。而给股票估值需要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但一般人不会这样做。这些投资者相信一些经常可以听到的观点，然后就对其做出反应。

张军：有效市场假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基础。对这一点您怎样反驳？

Robert J. Shiller：法玛因为创造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个术语而出名。法玛今年已经 70 岁了，他自己承认说他的理论错了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我猛烈抨击他的理论，那我也会成为一个不善良的人。所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尽管它并非 100% 正确，但它仍然很重要。但我的确有一件事让法玛恼火，那就是在待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周里我曾多次祝贺他成为击败市场的人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他的人生经历很有趣。法玛的确在击败市场上有诀窍，他有一名叫 Booth 的研究生学生，他成立了一家叫 Dimensional 的公司，请法玛去做研究部主任。他们赚了超过 3000 亿美元，利润多得以至于 Booth 后来回到芝加哥大学，向商学院捐了 3 亿美元，之后商学院便改名为 Booth 商学院。这些钱主要来自于法玛击败市场的智慧。我向他讲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上去十分恼火。法玛是发现市场中的泡沫的专家，但他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方法。法玛认为他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市场是无效的，只是他考虑了风险因素，一直以来人们仍然是完全理性的。这与他的行动不相符，我们必须让他解释这件事。在我看来，按照法玛的理论，市场的确是可以预测的，只是这种可预测性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人们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法玛便针对这个向投资者提供特殊服务。顺便说一句，其实我很欣赏尤金·法玛，就像欣赏不同政治阵营的对手一样。我会认真读他的研究，因为他在做研究方面很聪明。

张军：那他对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Robert J. Shiller：法玛曾经写过一篇行为金融学的综述。而我在近 25 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行为金融、心理金融学的发展。他告诉我他对于自己在行为金融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很骄傲，因为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提交上来的行为金融学的文章——事实上，他曾经做过其中很多篇

的推荐人。而他被引用得最多的论文也是这篇关于行为金融的综述。他并没有将行为金融学驱赶出理论界的意思。他对我的温暖态度与我对他的一样。

张军：我记得你曾经在环球金融杂志 (Global Finance) 上面写过一期专栏，我也碰巧是这一杂志的专栏作家。我记得你那时候的题目是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科学？

Robert J. Shiller：哦对，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将真正的研究人员与普罗大众加以辨别。就像医学一样。有很多人都声称他们可以治病，他们声称自己有神奇的法术或者能力，我知道中国也有很多民间偏方，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东西，但可能这并不都是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 1958 年被设立，奖项被命名为“经济科学”，但现在很多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并不是科学家，很多人考虑了政治因素。但现在经济学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人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是伪科学。有些人只是写下毫无意义的复杂数学方程式，就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很多人建立的是无法被实证检验的理论。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是真正的科学还是伪科学。很多人会抱怨说诺贝尔奖不应该设立经济学奖，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但我认为这不对，经济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应该严肃追求的学科。因为它在研究中包含了人的参与。经济世界很复杂，有很多种搜集证据的方式。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证据有所选择他们趋向去忽略那些很明显的、无法被科学方法证明的事实。这也是导致金融危机中的泡沫形成的一部分原因。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如此有权威性，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投资者可能过度兴奋或者过分推高了价格。通过与人们聊天、听他们的回答得来的证据不被关注，因为它们不是科学的。我喜欢和人们聊天，比如出租车司机。

张军：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去了哥伦比亚，并且在在哪里与出租车司机探讨房价问题对么？

Robert J. Shiller：我问出租车司机，你们知道房价问题么？他们告诉我，现在的情况简直太疯狂了。我去迈阿密，与那里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们认为将来的结果将会非常糟糕，他们建造的房子多过需求。然后我回到佛罗里达，发现那些人仍然在办公室里面写公式，没有人对于房价问题发表

看法。这让我怎样把那些出租车司机的想法说出来呢？我自己认为可能出租车司机对问题的理解更准确。

张军：你认为现在有太多资金流入金融市场，而现在人才的情况也很相似。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年轻精英们进入金融领域，而在中国也相似。你对此有何看法？

Robert J. Shiller：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泡沫。历史上曾经在金融从业人员上面也有泡沫，而它在1929年危机结束之后也破裂了。工资急速增长，大批人们进入金融行业。但我自己是现实的科学的大力支持者，比如神经科学、物理学等等。年轻人不应该都去学习经济学，应该有更多人来研究这些学科。当今世界的一大变革将来自医学。他们研究人类大脑的构造，然后提出经济学方面的观点。他们搜集神经科学数据，然后将之用于经济学。经济学不是孤立的。如果回到17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研究主要由哲学家完成——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他们都是哲学家。我儿子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有时候他回家跟我说他所学的内容，我觉得跟我在经济学研究中所看到的东西很像。神经科学现在正在高速发展。未来很难预测，但我要说神经科学将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耶鲁，很多学生同时对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都很感兴趣。曾经有学生跟我说，整个经济学都是建立在人们“效用最大化”的思维模式上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在人类的大脑中应该有一部分发挥着这个作用。他想要找到这个部分。这将是一个需要十到二十年来完成的项目，而我估计他是找不到的。

张军：现在人们对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形势都很关注，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你对于刺激政策实施之后美国房价上的泡沫形成感到担忧么？

Robert J. Shiller：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很多方面。美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GDP增长很稳定。1929年大萧条和二战对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这之后美国经济一直保持每年2%的稳定增长，这一稳定性是十分显著的。当然除了2007-2009年之外，因为金融危机使整个经济水平下降。

张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差别更大。它们可能会保持10-25年10%的强劲增长，然后经济

增长就会减缓甚至衰退。而美国则可以长期保持2%的增长。对这一现象您怎样理解？

Robert J. Shiller：衰退总会发生，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那么强劲的增长。中国正在从高速发展转为以温和的增长速度发展。我听说中国现在很关心环境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很流行，匹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它的可读性很强。这本书描绘了贫苦人民的漫长历史。它对于不平等的观点像马克思一样，与财富的积累相关。其实这本书在美国备受推崇很奇怪，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太喜欢马克思。作者强调对富人征税，来减慢财富的积累速度。我们必须征税，否则不平等将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我们应该对税收有所计划。我认为在当今世界的不公平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劳动技能的真正的工作阶层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另一个关于当今世界的事实是，年轻人都会环游世界。他们并不会把一个国家看作自己的祖国，就像在伦敦，在一场签售会后一个女孩拦住我，她跟我说这个房间中没有人是英国人，他们来自中国、印度、德国……我也不是英国人，那为什么我们会坐在一起讨论英国的事情呢？这就是人类的趋势。我觉得在未来的50年，世界将会是这样：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将会环游世界，但仍将有些人被留在当地，而他们将会变得贫穷。我对此并不开心，但这很可能会发生。

张军：最后，关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减慢。有人说这是因为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监管太多。政府想要把房价中的泡沫挤出去，但这可能会花费10-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会受到影响。对此你怎样看？

Robert J. Shiller：由于你们独特的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不同。并且市场经济在中国只发展了30年，你们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经济衰退。

寻找低碳发展的新动力

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 采访者：吴力波（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编辑：姚毅



吴力波：Michael 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全球最权威的气候期刊《气候政策》的主编，同时您也是研究气候变化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从最热门的话题开始聊起吧。您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峰会有可能达成国际共识吗？能从您的角度来谈谈对这次峰会前景的看法吗？

Michael Grubb：我觉得目前还不太确定。首先关于全球气候谈判达成共识是极其困难的。毕竟这牵涉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而每个国家的改革进度和相关政策也是不同的。但我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峰会比对哥本哈根会议更加乐观。因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主要讨论京都议定书是否会继续使用。从本质上来说这两者是不同的。就像一辆脱了轨的火车无法做任何事。巴黎峰会的情况十分不同。我相信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可悲的是大家的期望也越来越低。因此，没有人是真正希望出现一个全球碳排放协定的，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吴力波：所以并不会会有减缓全球变暖的绝对目标吗？

Michael Grubb：我们并非要构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我的意思是针对工业化国家的减排，甚至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可，比如美国。我敢肯定，这次巴黎峰会上，一定会有许多国家将努力实现其目标排放量，但并不一定背后都是因为法律约束力。

另外，在巴黎峰会上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广泛共识。这次的主要参会者想要借此达成减排协议。并且美国正处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的第七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会采取这样适度强硬的策略，部分原因想给换届带来一个挑战。因此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中国也很想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一致。尽管目前欧盟方面处于弱势，但也希望借此达成协议。这些全球主要参与者需要在政治上排除万难才能得到解决办法。最后关于此次峰会我想谈的是，通常在国际谈判中，这样的全球性峰会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突破，各个国家希望并肩合作来探讨协议的细节和必须推迟的方面。我个人的愿望之一是希望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化的共识，15年前我们有了《柏林协议》，之后又有了《京都议定书》，也许几年后我们会看到北京议定书的出现。我希望并不全由巴黎峰会来包揽所有功劳。

吴力波: 所以, 我们可以期待下这次巴黎峰会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我也同意您看好这次达成共识的观点, 我本人因为参与了 IBCC 第五次政府评估, 最近几天我们将会对第三小组的 SPM 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 我们也觉得政治压力真的很不平衡。从中方角度来看, 昨天潘家骅教授也提到过, 中国政府所做的许多努力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 不仅是决策者, 还有一些科学家, 他们也试图忽略某些部分。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该领域的英文刊物。即使是在英文期刊上发表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本地碳转化或者是改善环境监测制度相关的文章, 国际社会也不会平等对待。某种程度上让中国学者有点郁闷。

Michael Grubb: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信息传播太慢, 因此在一定区域政策发展和科学探索上时间会有先后顺序。尽管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做出了相应的努力, 但仍然会发现其他地区在发展上会落后两三年。

而语言则是另一个障碍。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而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人们思考方式的问题。我自己生活在北美洲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氛围中, 也有放慢发展的速度来获得共识的倾向。但我们可以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第三个问题, 也不是那么难以对付, 即气候变化的政策变得非常政治化, 虽然不是所有地区都如此, 但在美国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强大的利益集团常常试图阻碍美国气候谈判的进程, 比如废除杀伤性武器。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有根据中国采取的行动来进行的。他们往往对来自中国的积极信号闭目塞听, 因为会有损美国的立场。我谈到的只是一个小而强势的利益集团。对于中国许多的作为他们都会阻止其发生在美国。最有力的理由是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做什么, 美国做这些有何意义。因此他们不愿接收外界好的讯号。不过学界绝对会尽量避免这些尴尬, 这才是科学的原则所在。

吴力波: 是的, 我认为上海论坛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鸿沟。

Michael Grubb: 我个人认为, 西方传统观念会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我还发现如今人们对我刚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事情惊讶不已。这次我与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进行

了一次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开诚布公的会面。我周围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 他们并没发现中国的文化。您刚刚也谈到一些问题也试图去理解, 因此只有靠时间来克服这些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障碍了。不过我们会加快脚步的。

吴力波: 我们昨天聊到了您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我也大致地拜读了一下, 当我看到“三个皮特的探讨”这一章时, 觉得对现在的中国十分重要, 毕竟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正在转型阶段中。要知道,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 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双轨制的问题。一方面, 我们试图放开市场监管, 从西方社会吸纳市场机制和经验。另一方面, 我们尽量保留一些市场不进行改革。但现在中国政府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改革特别是能源领域。一些人认为我们只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然后政府就不用监管了。但另一些人依然担心这项机制能否在中国有效推行。您提到能源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都表明市场虽然十分重要, 但也不应是唯一的手段。西方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也很重要。所以, 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我们可以如何利用三个皮特的概念来进行能源管理改革吗?

Michael Grubb: 好的。我很高兴听到您认为这本书很有用。我很好奇中国的学者是否有机会就此进行研究。我不能保证这对中国有多少用, 还需要中国的研究人员来思考之后才能决定。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基于我过去研究气候变化的经验, 我不太满意西方传统解释: 只需要引入竞争机制, 然后为破坏环境买单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从我个人从政的经验来说, 这远比大家认为得复杂, 并且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政府的行动经常会被学者认为效率低下。实际情况更加复杂, 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市场和价格只是一部分,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仍留下许多缺口。也有些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工具。我觉得许多人生活在严谨的经济环境中, 没有意识到许多环节是需要科学来解释, 并被恰当地结合到一起的。这也正是我想做的。

吴力波: 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和决策层真的需要弄清楚关于能源和资源管理的各类机制。如今我们正视图打破旧的体制, 但当我们建设新的体制时必须从全盘来

考虑。我认为您在欧盟所提供的经验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能源结构调整方面我还有一些疑问。其实英国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英国在放宽能源市场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同时也是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的先驱，许多国家也向英国效仿。对于中国或亚洲国家来说，能源结构也十分重要。许多国家会对石油产品提供大幅度补贴。我们该如何调整能源结构呢？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行绿色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又必须减少化工原料的补贴。因此根据英国或欧洲国家的经验，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逐渐有效调整价格体系，从而既能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又能改善能源结构呢？

Michael Grubb: 英国对煤炭生产有一定的补贴。不过现在人们可能不会记得，当时出现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英国是一个促进低碳经济的国家。就在三十年前，英国被称为煤之岛和油气之海。不过，国内煤炭成本较高污染很大，能效也不太高。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她想让英国不再依赖煤炭作为产能。这也成为帮助英国国内能源转型的一个因素。当然企业私有化通过引进网络系统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并且降低成本。但减少能源补贴以及规定能耗价格一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很难让人们为能源环保付更多钱，这需要一个好的说辞来让人们接受。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环境，另一方面提高能效也可以减少我们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必须承认的是在许多重大改革过程中，会倾向对某些行业进行保护，毕竟阻碍改革的过程一直都很困难。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达到的目标。也许英国只是比较幸运地在新一代天然气热时开发了北海地区天然气，也确实有助于降低能源价格。

吴力波: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北海的天然气也在减少，对不对？我注意到，英国也试图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大单，确实给许多人带来希望，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政府的长远规划，仍然把燃料结构转型的重点放在核电和天然气上。看看这个 2020 年和 2030 年的计划，核电会成为除了水电之外的第三大发电能源。但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大众仍然担忧核电的安全问题。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Michael Grubb: 英国的情况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和民间社会一直强调，我们需要核能、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作为三个主要能源。这是某种政府的解释，碳捕获仍未如人们期望般进展，但这在英国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煤炭生产。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核电和可再生能源，要求能源市场进行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两种能源都是资本集约型市场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核需要很长的期限进行融资。因此，政府现在已经达成了一项新的核电站来改进，也有欧盟相关的配套设施。能源价格最终比人们五年前的预想高了很多，超过两倍。当然，在欧盟和英国所谓的核复兴会慢很多。至于中国，我不敢评论，因为都是国家的选择。从我的观察来看，核能比大多数人预期的供给更困难，价格也更昂贵。

吴力波: 到目前为止，运行核电机组在中国并没有那么贵。也许是因为中央政府给核工业提供补贴和减税政策。如果您看一下电价，核能甚至比天然气更便宜，这就是中国的情况。但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安全问题。在建的核电站使用的是第三代发电机组，它比正在运行的机组昂贵的多。俄罗斯与中国政府虽然签署了天然气合同，但在业务方面，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它只是一个政治信号。

Michael Grubb: 这对中国是非常有用的附加能源，因为天然气比煤炭更清洁，并且核比天然气更清洁。

从全球视角看上海自由贸易区： 我们需要想象力与耐心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 采访者：尹翔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 编辑：陈宇婷



尹翔硕：您是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请问您的组织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呢？

Graham Mather：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已成立有 12 年之久，它的功能是提供一个关于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意见交流平台，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型会议。2011 年是在上海举办的，同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诸如开罗、巴黎也举办过。我们偶尔会举办小型的地区会议或与国际权威机构、世界关税组织进行对话。这个协会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尹翔硕：您参与这个活动多年，一定对世界各地的自贸区都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全球各种自贸区的发展吗？

Graham Mather：自由贸易区的理念发源于 12 世纪诸如吕贝克、汉堡这样的北欧城市。在那里商人们希望自己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商业贸易的意见成为城市里的主流倾向，同时也渴望摆脱神圣罗马帝国君主和贵族的统治。所以城市开始有了明显的分界：一类是传统好战的城市，充斥着领土扩张的热情；一类是自由城市，它们组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减少贸易壁垒的共同市场——汉萨同盟。到了 20 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三个阶段的自由贸易区。首先是单纯的集中交易货物的区域，类似码头，很少受关税的制约，商人们在这里进出口自己的商品。接着是类似中国经济特区这种更复杂的贸易区。到了第三阶段，迪拜港等城市自由贸易区兴盛起来，这种自由贸易区拥有金融交易所、国际金融中心、网络城、大型国际医疗保健城，少控制、低税率、更自由的管理方式被更多地运用到项目建设中。

尹翔硕：您认为自贸区可以进行分类吗？

Graham Mather：自贸区是一个划定的特殊区域，享有特殊的经济制度，和国家中其他地区比起来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所有的自贸区都可以被划分为上面所提到的三种类型。

尹翔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贸区？您认为自贸区在全球经济和各个国家的经济中有着怎样的功能作用？

Graham Mather：当一个国家开始建设自贸区时，它就在传达一种信号，里面包含着多种信息。对于国外的直接投资者来说，这个信息就是“欢迎”，好比贴

出了欢迎商业来往的告示。其次，它表示这个国家会减少贸易壁垒，可能是关税层面上的壁垒，也可能是两国经济合作上的壁垒。它表示两国可以加速合作。建立自贸区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它会带来一系列的活动，比如科技园区，或者专门人才的汇集，又或者在一些更老的自贸区是出口和出口加工的汇集。人们虽然不确定整个国家经济体是否能很好地运转，但他们喜欢自贸区提供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

尹翔硕：各个国家的自贸区都是同样的重要吗？怎样的自贸区更成功？是由区域定性的还是由其本身的类型定性的？

Graham Mather：我认为自由贸易区更多是由其所在区域定性而非由其本身类型定性。比如，尼日利亚的主要自由贸易区都建在油气生产区，这些自由贸易区非常成功，为贸易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伊朗模仿了这种方式，也将在油气生产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自由贸易区的重点会放在日用商品、电子商品、网络产品上。我认为很难笼统地为所有贸易区定性，但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自贸区项目的建设都是从大型经济体中发展出来的。中国通过建立自贸区加强其经济的发展，说明自由贸易区有其存在的理由并将一直存在着，印度也拥有上百个不同种类规模更小的自贸区。这都在传达一个有趣的信息，虽然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转型时期暂时的产物，但自贸区已越来越显示出其长久性及其对整个经济体的示范性。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内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自贸区的重要性，对它的批判会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少。

尹翔硕：您觉得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特区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中国仍然需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Graham Mather：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试验示范区，其重要性是十分显著的。它意义深远且会给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一个自贸区是国家领土范围内拥有制度特权的小区域。从整个国家经济体来看，这样的安排存在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和不对称性。自由贸易区之外的公民也希望享有同样的权利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上海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全世界第一个被设计为政策实验区的自贸区，而这些政策有一天也会被扩展和复制到中国国家经济体的其他地区。这是一种非常有创造力且有效的方式，它规避了可能造成的紧张矛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构想，它使得自贸区和整个国家经济体都充满了潜力。

尹翔硕：当自贸区不能有特权或者政策优惠，自贸区如何履行其试验的职责？其中的困难是什么？

Graham Mather：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政策的实验区

和它享有特权的性质是不同的。比如，在自贸区内，作为一个试验性的样本，保险公司银行的所有制将被考察几年，如果行之有效，将被运用到全国范围内。这是在一个划定区域通过实际实施考察效果的做法。在为自贸区设计时，国家不会设计它们不想运用到全国经济体中的政策。就算自贸区里可实行商品零关税、金融服务零关税，难道全国也可以零关税？既然不行，那么这样设计就是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里长期实行不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的经济将会变得不正常、不稳定。将自贸区内和国家经济体结合起来考虑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田和世界上其他自贸区未来发展成功的关键。

尹翔硕：我们能否在自贸区采用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并首先在周边国家实施？

Graham Mather：标准化和掌握时机对于资本自由化非常重要。如果自由化进程过快，资本将以不可控的方式流入自贸区，这将带来危险。我们还需注意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管、资本管控和准备金要求之间的关系。这其中的风险肯定会逐渐减少，但只会是减少而不可能是完全消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减少风险，催生出一个繁荣的金融服务业市场，而不破坏审慎监管，以免重蹈美国和伦敦历史上酿成灾难的覆辙。

尹翔硕：您对于央行上海总部在5月22日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有何看法？

Graham Mather：《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是资本自由化过程中走出的第一步。这个政策的只限于已在自贸区建立并登记注册的企业，政府很显然是想对这些账户的使用进行严密的监管。我认为这是银行监管的标准化步骤，我相信政府会做好这些工作，我也相信从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今后复制该政策的地区来说是十分核心的启示。所以我认为这是“试验”的真义所在。我曾与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给北京的建议是“耐心”。中国还有许多时间，没有必要操之过急，企图在一夜之间就完成转型。虽然可能有人批评说在过去的8个月中，上海自贸区没有很明显的进展，但我们可以忽略这些批评，放松，耐心点。也有人会说这是可怕和令人担忧的，我的同事的意见是保持耐心和镇定。让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是条非常机智的、不错的意见。

尹翔硕：您对于上海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您认为上海自贸区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Graham Mather: 我认为上海自贸区面临的困难是由其所受期待较高带来的。高期待会带来很多压力。要做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将金融服务业与已有的管理系统顺利地整合起来是一项非常需要技巧的任务。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副市长在上海论坛中提到我们面临着挑战,我认为这是严峻的挑战,但它们也是很好的挑战——是应该出现的挑战。所以正像世界银行提供的建议所说的,我们应该做到有耐心、镇定,循序渐进。在英国的政府系统中,批评往往是另一种。在英国,我们往往认为我们做决策过快了,我们还没有考虑周全,我们还没确认共识,如果世界改变了这政策还有效吗?政府里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对于明显看重可预测性和长期收益的海外投资者尤其是一种警示。现在中国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不要一味盲目向前。

尹翔硕: 您认为政府所有的自贸区和非政府管理的自贸之间有什么不同?

Graham Mather: 我曾向上海政府建议,可以考虑在未来合适的时机采取政府所有合同管理的方式。可以先在实验区试试,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试行之后看看试验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拥有较宽松环境的私营部门中产生的创新来源于政府所有和私营管理的完美结合。

尹翔硕: 您如何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发展和其与自贸区的关系?

Graham Mather: 自贸区的精神就在于减少贸易壁垒和关税,这对于金融服务业十分重要。虽然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但我们没有针对全球金融流通制定规则的世界金融组织。如果美国、欧洲、金砖五国能保持金融服务业管理上的统一步调,对于全球化是非常有益的。但我们现在的步调并不一致。我们不能走向教条主义,应更富有想象力。在未来全球的发展中,金融服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真诚的开放、多边主义的精神、来自中国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增进对话都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发展。如果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走得更近了,我们将看到人们是不是需要中国,我相信他们是需要的。

尹翔硕: 您认为上海自贸区对于其他地区自贸区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Graham Mather: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自贸区虽然越来越多,其形式却越来越僵化,一旦建立了自贸区,就不会根据区外其他地区 and 全国的政策进行调整。我认为这是不幸的,但我相信有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上海自贸区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真正看作试验田的贸易区。这会对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上海成功了,其他国

家政府会这么想“我们也有自贸区,我们采纳他们的经验吧!”,或者“为什么我们不试试这个想法,看看能不能效法中国?”。所以我认为,实验区这个想法不仅本身在理念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对于其他也拥有自贸区的国家来说,会带来莫大的鼓舞与欣慰——中国通过自贸区达到了对全国经济体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认为上海自贸区不会失败,它将复制、被跟随。

尹翔硕: 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个自贸区? 您对这些自贸区的期望是什么?

Graham Mather: 据目前使用得较多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概有 3500 个自贸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比较小的经济区。享有比较重要经济地位的自贸区至少有 1000 个。考虑到自贸区发展议题的学术重要性,目前针对自贸区发展的学术研究还相对薄弱,这是一个年轻经济学者可以一举成名的研究领域。但国际组织也发现,去给该议题下定义并收集相关数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好的。所有的现象表明自由贸易区正在为国家的 GDP 发展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随着贸易区数量的增加,区内项目建设的想象力越来越重要。我预测世界上自由贸易区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并且希望它们可以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最想看到的是上海自贸区的经济政策转变为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到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区域性的政策如何演变为全国性的政策。

尹翔硕: 我想您的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平台,一定会扮演更多的角色。

Graham Mather: 有一个叫做“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的新组织刚刚在迪拜成立。这个组织被设计为一个游说团体形式的,有常任秘书处并且会更系统地与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对自由贸易区进行个性化分析并推动它们的发展。我非常希望它能够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将成为世界舞台上又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有利于自贸区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推广。

尹翔硕: 您对上海论坛有何寄语?

Graham Mather: 能参加上海论坛我非常荣幸,主题会议意义深远,有独创性、富有想象力,与会代表都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和有影响力的同行。我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有想法的人们聚在一起,从中长期的角度、以思想开明的态度探讨问题。人们在这里直接表达他们的想法,没有模棱两可,这种对于表达自己理念十分勇敢的态度对论坛做出了贡献。

亚太形势和中国的亚太政策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 采访者：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编辑：刘璐茜



吴心伯：沙大使，早上好，感谢您接受上海论坛的高端访谈，今天我们访谈的题目是当前的亚太形势和中国的亚太政策。首先我想请您评价一下当前亚太地区的总体形势。

沙祖康：亚太形势要分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从经济形势来讲是好的，这个好是相对其他地区来说的，特别在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亚太地区继续保持了经济上的活力，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从政治关系上来讲，我觉得总体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在各方的配合下，亚太成立了很多机制，APEC，10+1，10+3等都逐步进入运作的状态，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了解。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三，从安全形势来讲，这一点特别突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现在还比较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另外我们和菲律宾还有越南的关系应该说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出于这几个因素，政治、经济，包括一些领土纠纷，综合起来讲，亚太相对于西亚北非，相对于其他任何地区来讲，我们总的来说，还是和平稳定的。

吴心伯：现在国际上讨论亚太形势，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所以讨论亚太问题当然离不开中国因素。可能今后中国因素会在亚太地区的形势和发展塑造中越来越突出。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亚太发展形势中的中国因素？

沙祖康：我觉得中国从世界范围层面来讲的话，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一方面是指规模，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就像总理说的那样，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走过了发达国家近三百年所经历的历程，我完全赞成。所以中国自身的发展带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发动机，这在国际社会是一致公认的。从前景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以持续下去，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功臣。但这里有很多的条件，取决于我们内部改革、经济转型等等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当然这

里会有很多的曲折。从外部来讲也取决于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另外从邻国来讲,还要能够增进邻国对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解。这需要大家的配合。双方,特别是中国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吴心伯:就是说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互动,它不是单向的,也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的重大利益和核心利益。那么您觉得在当前中国的亚太政策里,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哪些问题?

沙祖康:应该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政策是很正确的。大家都知道,在上届政府期间,我们提出了睦邻、善邻、友邻、富邻的政策,应该说这个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亚太地区,我们可以打开地图看一看。比如说,中日问题。实事求是来说,我们的关系现在不是好的,出现了中日复交以后的低谷状态。还有朝核问题,十几年来我们有三项坚持: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朝鲜问题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坚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实事求是来说,我们确实做到了坚持,但坚持的效果怎样?朝鲜原来是个无核武器的国家,充其量是个有发展核武器、成为核国家的强烈愿望的国家,但十多年的坚持以后它成为了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朝鲜问题引发出来的大量问题:日本借口朝鲜问题要修宪,要加强国防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某种意义上也借口朝鲜问题,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它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服务;韩国是出于正当的关切,其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影响客观上也激化了朝核问题。毗邻的国家里,俄罗斯也是我们的邻国,当然我们关系很好,但日俄关系不能说是最好状态。再往南到东南亚,这是我们最近出现的问题,首当其冲是菲律宾。这个问题越闹越大,我们的关系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而且有越来越恶化的倾向。菲律宾问题也使东盟内部出现了分裂,有的国家不赞成、不支持菲律宾,甚至反对,有的同情菲律宾,有的支持菲律宾,像越南。从东盟这一片来看,我们的关系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往下走,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显然也是恶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几十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对华人华侨这样的行为。这种变化是很出乎中国意料的。

从中国来说觉得很委屈。从南亚那一片来说,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我们和印度关系有很大的改善,跟巴基斯坦是一直关系很好,当然这也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东亚、东南亚、南亚,我觉得都存在问题,再看中亚,我觉得这一块有很好的改善。

所以环顾四周形势,有积极面,但也有很多消极面。我们应该好好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睦邻、善邻、友邻、富邻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政策的落实上还需要改善。新政策也要基于原来政策的基础上,是原有政策的总结和提升。我总觉得,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应该认真地、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实事求是地对我们政策的推行进行认真的反思,哪些是可以继续改善的。谈不足是很忌讳的,尤其是在外交事务中。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自己犯过外交错误,这是国家尊严问题。但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反思,而且要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加以落实。

另外还有外部因素,中国和那么多国家打交道,有的关系不是中国想变好就能变好,我觉得还需要外部的配合,那么就需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性地实行一些政策和方法。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我们虽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能力还是有限。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强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可能独当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我们讲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亲,我们哪些地方还不够亲?为什么?诚,我们还有哪里可以改进?惠,那我们还要富邻善邻,哪些地方可以做到惠邻?要多予少取。因为在亚太来说,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存在多予少取的问题,而且还应该反过来,多取少予。亚太地区国家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有最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还有最不发达的国家,海洋沿岸的国家,小岛国家,内陆国家;有结盟国家,不结盟国家等等,怎么个“惠”法,这个是要有区分的,要落到实处。“容”的问题,包容文化要好好研究,同时我们也要独立自主。中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它首先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中国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睦邻善邻友邻富邻政策也好,亲诚惠容政策也好,从根本上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但是怎样服务好,我觉得不能光靠自己,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必须要进行国

际合作，尤其是要和邻国合作。那么我们的政策还要细化，分含义、分类别进行新的操作。鲁迅先生说过，我们应该残酷无情地揭露自己。我们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认真回顾、总结以继续前进的阶段。我们现在在形成正确的利益观，我们需要讲益，也需要讲利，我们外交的观念上也有很大的转变，都很有战略性。从政策的设计到具体操作，我们都在做，我感到很受鼓舞。但最近年纪大了，我多么希望能再年轻十年，走上一线，再做贡献。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存在很多问题，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快速的发展所产生的。我们的快速发展没错，但因为我们发展快，连续发展时间长，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应当感到高兴，前进中的困难和停滞或是后退的烦恼性质完全不一样。

吴心伯：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亚太政策，现在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历史遗留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利争端问题，我们陆上有14个邻国，我们已经与其中12个邻国解决了领土争端，主要是通过在外交往来中互谅互让，那么您觉得我们解决陆上争端的这些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决我们在海洋上的问题？

沙祖康：领土问题，不管是陆地还是海洋，大家都非常重视。这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家产，后代解决不好也对不起祖宗。那么中国人是这么说，外国人又何尝不是这么说呢？这个问题上应该要换位思考。地球一亿年前，你说是谁的？它没有主啊。其实从世界历史有的记录以来，以欧洲为例，它的边界什么时候固定过？从来没有，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说实在的，也充满内战。首先，领土问题是敏感的，很容易煽动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一点大家都接受，没有异议。在中国敏感，在对方也敏感。第二，领土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看到现在美俄关于油气的问题，当时你看着很好的，但你打开历史书看看，它原来是中国的地方啊。我说这话千万不能有丝毫的误解，认为我们还要把它收回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只想提一个问题：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它是可以调整的。边界一直都在变化。六七十年前外蒙古还是中国的，对不对？这样一来，在过去领土和领海的争端没有办法解决，只有通过战争，谁胜了就是谁的。所以海洋法啊、国际法啊都是近百年来才有的事，而且是由西方主导。所以今天世界发展到这个阶段，特别是核武及其运载工具的发展，一旦发生战争，它的后果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人类的毁灭和地球的毁灭。因此应该排除用战争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你说局部战争，你怎么能确保它不扩大呢？你能控制对方能控制吗？所以中国提出要和和平解决争端，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不是投降，也不是中国政府软弱。用战争手段解决领海还是领土问题，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非和平手段排除了，那么只剩下和平手段。解决办法只能是互谅互让，有取有舍，只有这条路。但有的时候你愿意和平解决，互谅互让，对方不愿意。我们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来维护和平，但同时我们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来准备好对方不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为了达到和平地解决，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来向对方表示：只有这条路可走。如果你要采取非和平手段，对不起，你自己再合计合计。所以我讲要有两个百分之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加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不能有丝毫懈怠。所以习近平主席说，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目的是什么？防止战争，来增进和平和协商解决的能力，也让对方考虑选择这样的道路。

吴心伯：那么我们在亚太政策和周边外交中，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常常会让我们的周边的安全环境和周边政策变得复杂起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在我们的周边外交中处理好美国因素？

沙祖康：我和美国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是赤裸裸的，是实实在在的霸权主义，不玩虚的，凭着自己的肌肉横行霸道。我是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我知道，无论你的武功如何高强，你都有命门。我要找到你的命门，照样收拾你。这点我们要有自信。美国不是生下来就是超级大国，他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才会有独立战争。他还经历了内战。那时候它也是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他是超级大国，也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审时度势，在一战二战当中，

从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用最小的牺牲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因此他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归功于正确的策略、政治家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要换位思考，如今美国千方百计想保持和延长它的一超独霸、鹤立鸡群的地位，但是历史沧桑剧变，中国的发展引起了美国发自内心的恐慌。美国为了保住其地位，有意扩张，遏制中国。美国是个非常实在的国家，它有梦想，但也非常现实。美国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能力跟不上。而且现在全球化也在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仍然是一马当先，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是下降了。美国在当前国际局势中还是相对克制的，比如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和朝核问题上，它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和风险对美国采取最有利的措施。

美国有它的担心，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传统。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没有扩张的基因——我们确实没有啊，不然要扩张早扩张了，郑和下西洋就占领别国了。中华民族确实特别爱好和平，是一个善良智慧的长者形象，特别友善包容，讲仁义道德。我觉得我们缺乏霸气，我们是王道。太平洋把我们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主席说太平洋足够大，能包容我们两个国家。基于以上看法，我觉得中美两国完全有合作的条件，另外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全球化、信息化、核武发展等等，我国及时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也没有选择，它只能接受，因为这个政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当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地区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这点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开启了基于中国文化的、与西方不同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其他国家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我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政策是基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各自长项和短板的认识，以及共同利益的需要。不管美国总统改选，政府怎么换届，唯有美国的利益是坚持不变的。中国也坚定维护中国的利益，这一点是不变的。我们不应被政府更迭困扰。我看中美关系是一种又爱又恨，爱恨交加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恨；爱多少，恨多少，要看具体情况。中美关系能好到哪去，也能坏到哪去；好了，就会变坏，坏了，就会变好。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有这种智慧。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自信。

吴心伯：好，非常感谢沙大使接受上海论坛的采访。今年是您和夫人第一次参加上海论坛，能不能对上海论坛今后的发展提出您的期望，让我们今后工作做得更好？请您寄语上海论坛。

沙祖康：上海论坛办了九次，积累了很多经验。准备非常专业化，问题选择非常有针对性，讨论有深度，当然还可以改进。大体上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参与和组织了几十年国际会议，我组织了潘基文称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大会——2012年在巴西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峰会。我有资格来讲，上海论坛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如果真要寄语，我只能这样说：上海论坛办得很好，我坚信会办得越来越好。

人民币国际化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

■ 采访者：许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梁丹怡



许闲：首先我想感谢您能来到复旦大学参加上海论坛。今天，我向您提的问题将主要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主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Yves Mersch：我觉得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十分愿意参加上海论坛、十分渴望重回上海的原因。我想亲眼看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而上海又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久前，上海实现了直接在人民币和欧元之间进行的国际贸易。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因为这一发展是符合人民币走出去这一梦想的。请让我说说我为什么相信世界期待人民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贸易量占到了世界总贸易量的9%，仅次于美国；并且，已有预期显示到明年，中国三分之一的外贸将会以自己的货币进行。

许闲：好的，感谢您的回答。我们都知道欧盟在推行欧元上是十分成功的，您认为中国可以从欧盟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吗？

Yves Mersch：我认为，在有一个领域，欧元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到中国货币走向开放，该领域就是深化和整合市场。欧元区当局希望欧元区能够实现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他们希望深化资本市场。最近我们看到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的增加以及债券到期时间的增加。为了辅助它们的发展，我们需要非常有效的支付体系基础设施，而在这一领域，我认为欧洲可以和中国分享它的经验。而且，对中国而言，在依赖美国这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产品和有关它的知识外，再学学欧洲的经验，会十分有趣。并且，想必你们也会看到欧元的支付体系在危机之中表现出了它坚韧的一面。所以，我认为在这一领域，今后会看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强强合作。

许闲：中国国内目前有许多言论颂扬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带来的机遇，但我今天想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问问您觉得人民币国际化在近期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Yves Mersch：我之前已经在一些会议中说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一定

是伴随着挑战的。我们不能有这种预期，即国际化不会提高资本市场的波动。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而我认为风险的双向性也是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图之一：你若是要国际化，就得承受更多的波动。汇率的波动也会带来更加准确的商品价格，进而扩大市场在一个纯中央主导的经济体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最终会带来更好的资本配置。而得到更有效分配的资本将会增加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以中国为例，我认为这种双向风险会带来产品市场的多样化，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更平稳过渡，我想这同样是政府的目的之一。

许闲：好的，那我接下来想问，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呢？

Yves Mersch：人民币国际化将更好地整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它将实现贸易以及对内对外投资的便利化。并且，我昨天也提到，中国吸纳的国外投资和中国的对外投资都增长迅速。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世界资本分配的不均，并且更好地平衡中国的国内经济。

许闲：谢谢。我们都知道法兰克福是欧洲的金融中心，而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您认为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会给这两座城市带来一些机遇吗？

Yves Mersch：任何国际化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正如中国有自己的一些金融中心，欧洲也有许多不同的金融中心，各自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从某些程度上说，不同的金融中心之间是联系紧密的。在欧洲，法兰克福有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卢森堡也和中国许多银行有合作，巴黎也表示它愿意更多地参与到人民币国际化中。当然了，还有伦敦，虽然它在欧元区外。我甚至要补充说，除了不同国家的金融中心需要合作，还应该在学术界发展更多的联系。我知道复旦大学和世界范围内其他优秀的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其他大学也是如此。例如卢森堡大学就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合作。我认为这体现出贸易、金融和学术界往往是最先建立紧密的国际合作的领域。

许闲：您对于中国和欧洲学者在有关金融领域的话题

上可以展开哪些方面的交流有什么建议吗？

Yves Mersch：我认为中国和欧元区在金融上最相仿的方面在于金融结构。由于我比较密切地关注有关金融稳定性上的问题，我发现中国经济的融资问题主要也是靠银行系统解决的，资本市场亦是如此。在处理这种对银行渠道融资依赖可能会导致的结果上，我想中国和欧洲更倾向于以一种传统的方式看信贷总量，而这种传统的方式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我认为，在这一领域，未来中国和欧洲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当然，我们也可以诸如金融稳定性、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展开更多交流。

许闲：谢谢您的建议。由于我是一名保险系的教授，所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会和我的专业有关。请问，欧洲国家的保险业是否和欧洲央行之间有紧密合作呢？

Yves Mersch：我认为在未来，保险业以及养老基金行业需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在银行去风险化的过程中，它们在更多地面临如何管理期限错配的问题。另外，它们将在如何保证长期内融资能力上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保险业和养老基金业可以介入、辅助长期内对内对外融资。我认为，在中国，情况可能也会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包括了保险和养老金。我认为，未来，非银行融资在为整个经济融资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对它们严加监管。

许闲：谢谢您今天精彩的回答！

Yves Mersch：也非常感谢您！

信心和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校长

■ 采访者：丁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Laura Natrop，姚毅



丁纯：我们都知道，您领导着荷兰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这所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医学等学科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得主也曾攻读过贵校的经济学专业。您可以对贵校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您对我们学校的情况很了解。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荷兰有 14 所大学，伊拉斯姆斯大学是其中的一所。这些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都很优秀，而且都排名全球前 200 名。一个国家的所有大学都很优秀，这其实是值得惊叹的。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为伊拉斯姆斯大学感到骄傲。100 年前，三位企业家发现了荷兰对贸易专科类学校的需求，于是创立了本校。之后，这所大学逐渐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大学，但与业界的联系依然很强，所以我们一方面研究经济、商业、法律和政府治理，另一方面研究卫生、公众健康等等。这是伊拉斯姆斯大学最负盛名的两个优势领域。此外，您提及了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校友 Jan Tinbergen，他是我们的骄傲。

丁纯：在中国，我们经常讨论教育问题。您能和我们分享您的教育理念，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的理念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首先，如今荷兰将近 50% 的适龄学生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是说，18-23 岁的荷兰人中，将近一半的人正在攻读专上教育，包括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注：专上教育，又称作第三教育，指中学教育后接受的教育。）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虽然荷兰是一个小国，但仍然值得思考的是，这么高比例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出类拔萃。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大学是应该区分化，录取一些人、淘汰一些人，还是应该更具包容性？荷兰的教育政策包容性很强，这不同于中国或英国，这两国教育的筛选功能更强。在荷兰，一旦你完成了中学教育，原则上你就得到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我刚刚提到，如果你的国家一半的人口去上大学会怎么样？他们不可能同样优秀，所以过去 20 年荷兰的大学一直试图提高学生的考试通过率。很多学生其实无力完成他们的本科或研究生教育，因此我们流失了很多学生。所以我们在伊拉斯姆斯大学所做的是，我们深入地调整了我们的课程，让学生将大学一年级视作“筛选年”。

虽然我们在入门的门槛上并不太苛刻，但我们在入门后设定了较高的选拔条件，所以第一年你必须修满应修的学分，不然你就要离开。在荷兰，这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没有其他大学会苛刻到让学生在一年级修满所有学分。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的成绩更优秀、更专注、更守纪律，他们在期限之前交作业，并且很少补考。他们的表现比过去优秀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种教育理念确实改变了学生。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顾虑重重，因为由于这种教育哲学，学生们可能不敢来鹿特丹了，因为他们在这里学习很辛苦。但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入学第一天开始就保持出色的这种挑战吸引了学生们，因为这正是他们去其他国家的大学时所得到的体验。他们必须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断挑战自我，没有别的路，也没得选。学生们也享受这种体验，他们迎接挑战，并且成为了更好的学生。

丁纯：所以这意味着师生必须勤奋学习。我们常说，有竞争才有活力。您有没有关于如何激发老师们创新潜能的想法，尤其是如何激励年轻老师？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当然，创新有很多方面，但让我列举两例。首先，教师当然需要更加国际化，这意味着我们期望他们出国交流的次数比以往多得多。我们希望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这对年纪大的教师可能比较困难，但对年轻老师来说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将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整合到课程中，我们期望他们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所以我们颠覆了教学方式。在过去，一节2小时的课上会有900个本科生。但现在我们给课程录音，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听录音，甚至是在他们带着 iPod 跑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学习。当他们来到教室时，他们不仅仅坐下来听讲，也与其他同学充分参与到每个课堂话题中，因为他们从其他学生那里学到的和从教师那儿一样多。不过教师们依然有他们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理念是让学生更多地参与，但这意味着老师们也要调整自己的思维，并在传达讲课内容时更具创新性。老师们一遍遍复述 PPT 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必须更具参与感，不光对学生，也对他们自己。他们也要参与到实际问题中，因为在鹿特丹我们有一套从问题中学习的机制。

丁纯：复旦是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姐妹学校，您能给我

们的同学们一些寄语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他们很棒，他们很出色！我们现在有大约 500 个中国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来自复旦大学，并且他们如此有上进心，如此不可思议地勤奋，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努力，而且他们对荷兰和鹿特丹的生活适应得非常好。我刚刚说过鹿特丹对中国学生而言是适合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学生通常习惯于生活的大都市。鹿特丹的城区有美好的氛围，有很多绿化，骑行族遍地，中国学生不害怕骑车，所以他们适应得很好。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确实发现他们非常礼貌，大多数都习惯于倾听老师，尊重师长。很显然，他们在一个尊重师长的氛围中长大。我们教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大胆，鼓励他们自由、自主思考，我们尝试教他们在研究中第一重要的怀疑精神。有时我们担忧当我们把他们送回中国时，他们会发现适应原有的文化氛围很困难，但另一方面，我们私下里认为他们最终成为了更优秀的研究者。但他们的确非常出色，我们非常高兴与他们相伴，并且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

丁纯：您也许知道，在复旦，我们有一个荷兰研究中心。您对我们的研究人员或活动有任何建议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首先，你们必须来荷兰访问，这对于一个荷兰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来说是必须的。你们不能仅仅在中国研究荷兰的文化、语言、商业或其他任何领域。所以你们需要出访，我们会全心全意地欢迎你们。所以这是我的首要建议，来这里自己看看。很多荷兰的大学都设有中国研究组织，他们一直鼓励学生在中国待一些时间，不然他们怎么学习呢？我很惊讶地认识到中国学生对研究荷兰有兴趣，并一直对此满怀敬意。为什么呢，我们国家这么小！你们有十亿多人口，而我们只有 1600 万左右！所以我一直满怀敬意地认识到有人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感兴趣，并想要研究它，我们对任何对我们国家足够感兴趣的人都很欣慰，我们随时欢迎中国朋友的到来！

丁纯：在欧债危机后，现在对“智慧增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意思是要用创新来促增长。您可以评论一下近期欧洲的经济局势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资格评论, 不过我愿意分享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欧洲在逐渐而缓慢地复苏。有些政客会告诉你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但我不确定是这样。看看银行系统, 他们缓慢地重新调整资本, 但这仍然远远不够, 他们的缓冲资本金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有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一大部分欧洲银行其实是“僵尸银行”, 很多都无法通过压力测试。当然, 这取决于你怎么设计压力测试。除了银行外, 工业的复苏也非常缓慢。工业依然被汇率问题所困扰。它们的利润达不到人们对业界的普遍预期。最不幸的是, 消费者信心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我认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政客很多时候并未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 因为他们一直告诉选民不要相信任何人, 尤其不要相信银行家。这也是 Robert Shiller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上海论坛开幕式上提及的一个观点。现在所有人都非常憎恶银行家, 政客通过使用比喻对这种现象推波助澜, 但实际上金融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燃料, 所以除非我们重新开始信任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 否则经济会停滞不前。所以信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即使基本面情况很好, 修复欧洲经济中破碎的信任是很困难的。此外, 欧洲一体化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刚刚进行了欧洲议会选举, 欧洲有一种强大的声音认为欧盟是失败的, 我们应当重新从欧盟中脱离。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声音, 是一股我们需要应对的强大声浪。一旦决定成立欧盟, 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只有一条路, 就是继续前行。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欧元, 不能没有财政联盟, 不能没有政治联盟。我们已经实现了经济一体化, 但我们还没有实现政治联盟, 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迈进。

丁纯: 您提到, 欧洲议会中怀疑欧盟的党派正迅速积聚力量, 同时对欧盟的信心也遭遇了危机。我认为欧洲保持联盟状态和继续一体化不但对欧洲, 对中国和世界也是好事。你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学者, 也是一个经济领域实践者, 所以我想听听您对银行业联盟的意见。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我认为银行业联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但达成这个联盟非常重要。重复一遍, 我不是银行业联盟的专家, 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迅速向欧洲一体化和银行业联盟迈进。理想而言, 会有一个全球的银行业监管机制, 虽然我可能认为太遥不可及, 至少在欧

盟的层面, 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欧盟单靠自身是很难解决全球问题的。

丁纯: 1979 年以来, 鹿特丹和上海就是姐妹城市。您来到了上海论坛, 谈了鹿特丹自由港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对鹿特丹做个简单的介绍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鹿特丹和上海一样是个港口城市。很多年以前, 我上学的时候, 我认识到鹿特丹港口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当然几十年过后, 按照不同的标准, 鹿特丹港口在世界上可能排名第 9, 第 10 或第 11, 并已经被至少 8 个中国港口赶超了。[注: 按集装箱吞吐量, 2013 年排名在鹿特丹港口前的中国港口共有 7 个。

丁纯: 但在欧洲仍然是最大的。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你说对了, 在欧洲仍然第一, 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你纯粹用量化的方法衡量, 比如船只吨位, 那么中国的港口都更大。不过, 荷兰的港口仍然对荷兰全国的竞争力有很大贡献。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全球竞争力指数, 荷兰排名第八。中国排名第 28, 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提升竞争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还认为荷兰竞争力的秘密是它不光看量化的竞争力指标, 还看质量指标。所以比方说, 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法治、对政府的信任、创新的税收和关税管制、一定领域内的高水平教育等都与社会创新有关。健康因素和环境议题也正日益重要。所有这些都使荷兰的基础设施高效而创新, 这提高了荷兰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排名。

丁纯: 您在上海论坛的闭幕式上谈到了上海自贸区。您能够对上海的这项试验提供一些评论或建议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试验。上海如此有趣的原因是我们看到在欧洲, 自由贸易区正越来越不受欢迎。我们以前曾有过自由贸易区, 但现在我们出于多种原因放弃了它, 一个原因是欧盟自身几乎已经是一个自贸区了。当然这只在欧盟之内, 如果你是一个非洲的农民, 你不会认为有一个自贸区, 因为对非洲仍然有着贸易壁垒。在欧盟区内有某种形式的自贸区, 但自贸区就管制、关税和货物运输而言正变得越来越

严苛。所以由于严格的管制，我们更容易放弃自贸区，而转向其他形式的创新，例如安全的贸易通道，或者发掘整条产业价值链，而不是仅仅盯着公司证件或公司的税务、关税证明。所以这些创新帮助了鹿特丹的港口。

我对上海的自贸区发展现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就像我们在上海论坛了解到的一样，上海自贸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它的核心不只是自由贸易，还有将上海与中国的其他地区连结起来，还有政府改革、管制改进，法治和仲裁，可靠的运作机制以及运作流程的结构，可靠的政府治理，也许还有改革的可持续性。我认为可持续性对整个中国来说正日益成为一个议题，对上海自贸区来说也是如此。

丁纯：就像你提到的一样，在这场试验中我们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在法治和监管领域。如我们原有专门关于合资企业或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可能需要修改。你对这些领域有什么建议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作为一名律师，我会说有法治，一个好的仲裁机制和一个法律系统总是好的，因为它们提高了外资的信心。所以我的建议是，一方面使中国的法律达到最低的国际标准，来激发外资的信心。另一方面，利用好那些曾让中国领先的比较优势。相比那些诉讼多发的国家，这其实是我欣赏中国的一个原因。具体来说，基于信任的社会在签订协议和达成交易方面其实是很有效率的。你不需要在谈判协议时带一个战斗营的律师过来。先相互建立信任，然后谈生意，效率会很高。对诉讼更多发的社会而言，就像 Robert Shiller 提到的那样，每二十个人就要有一个律师，这样的社会并不重视在信任的基础上做生意是多么重要。我的建议是在你们的社会中保持这样的信任，因为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旦信任失去了，再找回来就很难。你可以一夜之间失去它，但重建信任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另外，如果失去信任，那你会向美式社会转型，这样的社会中有如此多的律师，以至于叫辆救护车都会有律师跟着你到急诊室，问你需不需要法律服务。我认为如果今天的美国要重新设计法律系统的话，他们不会选择一个像现在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诉讼社会”。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他们事实上很羡慕你们基于信任的社会。所以我要说，保持这种信任基础，但同时要建立按国际标准来看最低的法治，这样跨国公司就有法可依。

丁纯：我们都知道，您在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都有出色的履历。作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女性，您能告诉我们这背后的诀窍吗？人们总是谈论做一名女性领导者的不易，你怎么想呢？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实际上，在荷兰并没有那么多商业或学术领域的女性领导者。如果我们观察整个欧盟的话，荷兰在男女平等上其实根本并不出色，在我所在的大学，只有 15% 的教授是女性。我当然希望这个数字能达到 50%，但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仍然非常远。对国际商业中的高级管理职位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荷兰的确大大落后。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其中之一是，荷兰有非全职工作的风气，当女性有了孩子的时候，往往选择兼职工作，花一些时间工作，花一些时间陪孩子。结果是，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晋升得比男性更慢，例如在学术领域中，当她们拿到终身教职时已经远远落在男性后面了，发表的论文数量可能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改变这种现象，但这种努力在学术领域中很不受欢迎，因为最后在专业任命时学者的年序是决定因素。所以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做一名女性是否有优势呢？当然有。我是说，每个人都看得到你，所以使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并不是难事。同时，你的风格与众不同，这有优势也偶尔会有劣势，因为有时人们不理解这种风格。你必须在工作中投入一些更多的精力。成功有秘笈吗？没有。成功的诀窍因人而异。对我来说，诀窍是努力工作，每当有一个机会时，一定要抓住它，不要害羞，不要害怕承担风险。有时机遇会有风险，但你的勇气会告诉你“啊，我准备好做这些了”，也许没有，但我得试一试。随时准备好尝试，冒一些风险，找一些能支持你的人。很重要是家庭的支持，因为如果你的家庭不支持你所做的事，你就会陷入大麻烦。同时工作上的支持也很重要。我身边一直有在我需要时愿意帮助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希望提供给与我共事的人同样的帮助。如果我发现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陷入困境，我会尝试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没有什么比发现年轻才俊更令我更感到满足、更有成就感的了，不论是有才华的男性还是女性，我都会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

上海论坛(2014)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部分代表于会后致信组委会,表达对论坛组织工作的感谢、对相关议题的延伸思考,及对论坛未来发展的期望。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上海论坛2014给我提供了一次开拓眼界、分享观点和结交新友的绝好机会,这的确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活动。

Adam Pos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很荣幸有机会参加上海论坛2014!这是一次享誉世界的高水平聚会,为复旦赢得声誉,为上海增添光彩。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上海论坛议题广泛,专家云集,讨论开放且自由,观点精彩而富有原创性,可喜可贺!会议为各国精英们提供了绝佳的高水平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David Richard Mares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

中欧双方经济框架体制下的金融体系有诸多共通之处,你们的出版物对于深化在这些领域的交流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上海论坛办得好,坚信会越来越好!望界都来参与并支持上海论坛。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校长

感谢上海论坛精心筹办了富有启发、充满洞见的三日盛会。你们的敬业、学识和能力使得此次论坛名家云集,也令我极为感动。祝一切顺利,希望明年能有机会再次参会。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

上海论坛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以期中国能够重新获得与其辉煌历史和强大活力相符合的地位。你们的坚定决心令我钦佩。



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
《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这是我的首次上海论坛之行,这也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期望再次相会。

感谢并祝贺上海论坛!

刘利刚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希望上海论坛在明年十周年之际做的更好、更实、更强。

谢湧海

中银国际副总裁

上海论坛:汇五洲贤才,集八方良言;论天地经纬,绘中华梦想!

上海论坛（2014）年会期间，组委会每日发布分论坛会议简报，并在此基础上，摘录、编辑代表观点，于闭幕式前汇总成《分论坛观点集萃》，即时报道论坛最新研讨成果。本刊撷取部分代表观点，以飨读者。

01
观点**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亚洲经济高端圆桌嘉宾

- 从全球化角度探索亚洲经济增长瓶颈问题。前三位演讲嘉宾均从各自国家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瓶颈问题，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研究应从全球化的角度，而不能只关注局部利益
- 经济的发展通过包容性来提升。中国不能忽视农村力量，而是应当激发农村的生产力，将其纳入到社会体系中
- 对影子银行的想法。虽然影子银行饱受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影子银行扮演了其适当的作用，体现了金融创新

02
观点**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分论坛嘉宾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因素

- 中国经济增长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区别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包含了很多结构性的因素。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性、非周期性减速的阶段
- GDP 增长的分解显示近年来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保持历史高水平，但是劳动参与率的贡献相比高峰下降，表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 服务业部门相对扩张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由于政府管制，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部门。所以，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严重偏向于资本，资本产出弹性达到 0.7，而其他国家一般在 0.3。未来会发生要素产出弹性的逆转，再加上投资增速的下降，造成 GDP 增长率的下降
-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问题在供给端，而现在刺激政策着眼于需求端。未来可以在税收政策方面进行改革经济增长与结构失衡

03
观点**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经济分论坛嘉宾

操控、加速和规模化：城市发展的中国模式及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启示。

- 从人口角度来看，生育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与受教育人口的增长相关
- 一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与受教育程度有关
- 经济增长只有资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
- 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力资本和研发的投入是很重要的
- 欧洲和中国的人口结构相似，但是经济走向是不同的。中国新加入的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在不断增加，因此增长可以持续，但是对于欧洲，新加入的劳动人口和快退休的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很小

04

观点

刘利刚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金融政策坊嘉宾

中国短期的经济展望

- 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到了 17%，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 CPI 下降，很多人开始担心会出现通货紧缩
- 一月份开始，在双重的干预下，中国政府强制让人民币贬值
- 未来必须允许中国的外汇变得更加自由地波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平稳的汇率水平、资本的自由流动，三大目标最多实现两个。因为中国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自由的资本流动，因此，中国未来必须允许中国的外汇变得更加自由地波动
- 中国不一定会出现房地产崩盘。中国如果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所面对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我相信中国应该不太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房地产泡沫

05

观点

Michael John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能源分论坛嘉宾

国际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

- 减少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很大，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逐渐稳定，我们也认为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确实有稳定的联系，但是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最近我们都知道，欧洲使用煤的比重正在增加，这是市场定价的作用，说明市场定价并不能总是成功
- 关注能源与战略的关系。其实能源领域的发展与政策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需要关注整个战略领域的发展，需要有工业化战略，而不能完全让市场自己决定。我们需要明确：能源战略的有效性是受限的，而市场定价、技术发明也同样是受限的。我们需要寻找一种途径，使政策制定与市场定价、与技术研发联系在一起。从而通过政府和战略投资，将消费者需求与研发联系起来



06

观点

Robert Ross

波士顿学院政治系国际关系学教授；
政治分论坛嘉宾

亚太地区的新情况

- 我们不能从欧洲的历史去推断亚洲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过渡的现象
- 妄图通过战争去促进东亚地区的权力转移是愚蠢的，东亚是完全可以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转移是和平的
- 中国目前主要进行两件事：其一，在国际事务上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和力量，其二，不断改善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07
观点**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亚洲城市和社会发展高端圆桌嘉宾

中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模式

- 亚洲城市特色的保留越来越困难，共性越来越多，个性越来越少，都从传统城市转向现代化城市
- 劳动力的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是完全不同的，新型城镇化要避免过去二十年来的圈地运动
- 人的城镇化要注重几个权利的实现，即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等。
- 市场、企业产业、社会组织应更多合作，寻找中国城镇化新动力，政府应该从过度抑制过渡到自然形成的过程

08
观点**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分论坛嘉宾

把增长的品质放到增长的速度之前

- 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产品质量问题很多，如食品、药品、建筑等。如果产品质量很好，那么就不需要这么高的速度
- 中国的投资很高，但是投资机制问题很大，因为每个地区都在投资，但是人口流动方向是集中向4个特大城市的，相当多地区人口在减少，这导致低效投资很多
- 速度很重要，质量更重要，这包括产品质量、投资质量、城乡布局等各个方面。但是目前指标不能自动反应，分析增长时如果脱离质量，那问题会很多
- 目前阶段，质量应该在速度之前

09
观点**赵晓斌**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政策分论坛嘉宾

- 数码科技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人们以前生活在农村，之后生活在城市，现在生活在数码世界里
- 制造业越来越多移到城市之外，城市不断数码化，知识化成为一个研发中心，成为一个文化创意和高端服务的地方
- 首要城市的主要功能首先是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其次是知识创造。知识创造和全球金融高端服务业连载一起，才能够成为一个首要城市

10
观点**徐剑锋**

维克森林大学医学院癌症遗传研究中心主任；
公卫分论坛嘉宾

遗传和个体化医学：机遇和挑战

- 癌症筛查的现状：
家族史筛查存在一定的限制，无法实现对癌症的完全筛查
- 癌症靶向筛查的需求：
使用遗传风险分值（GRS）来筛选高风险的对象能够产生补充家族史筛查，从而产生个性化癌症风险报告
- 公共卫生筛查中应用遗传技术的利益相关方包括：
遗传和公卫领域的研究者、政府决策者、卫生经济学家、医疗保障支付方、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方、遗传学专家、患者
- 个性化癌症筛查的机遇与挑战：
遗传学筛查是一种更具成本效果的公共卫生筛查技术，但这一筛查的应用将会带来巨大而复杂的影响。无论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这项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亦是大势所趋，因此需要更好地完成自我定位，抓住机遇，发展这项技术

11
观点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
“亚洲经济增长瓶颈，谁能率先突破？”
高端圆桌嘉宾

- 欧洲银行债务危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整个欧洲经济体系受到重创，但是如果有好的政策选择，势必会引领欧洲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避免新的危机产生。欧洲经济正在坚持正确的政策选择，不断恢复自身的实力
- 欧洲银行业规模缩减对欧洲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之前欧洲银行的债务融资过多，危机中止了这样一个模式。欧洲银行系统的去杠杆化会使得信贷供应降低，影响欧洲经济的复苏进程。但是银行业的改革也会对金融资产的重组产生积极影响，提高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为银行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为今后欧洲资本市场提供新一轮的发展机会
- 欧洲危机爆发以及经济复苏的经验值得亚洲国家借鉴。未来欧洲将继续出台进一步的政策，通过整合融资需求、资产证券化等手段，解决融资渠道单一的问题。无论对于复苏中的欧洲还是快速增长的亚洲而言，可持续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12
观点

Park Youngah

韩国科学技术评估计划研究所所长；
社会分论坛嘉宾

韩国科技人力资源政策的历史和未来趋势

- 韩国科技人力资源政策的历史是：制造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繁荣，国家政策支持科技人才相关法案实施
- 朴槿惠政府下的科技人力资源政策，未来将以科技为导向，五管齐下，进行人才终身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
- 未来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科技人力资源政策



13
观点

吴力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能源分论坛主席

电力大数据时代：环境与气候治理的新机遇

- 中国需要进行电力部门的革命。目前，电力消费占据了我国能源消费的 80%，而煤炭发电占据了整个电源的 80%。我们看到电源结构是存在问题的。关于这部分，我们团队和其他学校一起，正在进行一个电力大数据的研究
- 利用大数据推动改革。智能电网的速度发展非常快，目前我们有上海市 18 项实时用电数据，我们希望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方法，来促进电力部门的革新，比如提高整个电力部门的稳定性，比如运用数据很好的控制运行，利用波峰波谷信息来减少能源的浪费等等
- 研究和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这是我们目前项目的研究现状和展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促进国家电力的改革，从而促进能源结构的变革

14
观点**Vinod K. Aggarwal**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
政治分论坛嘉宾

- 面临的来自最小化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挑战与日俱增
- 亚太地区从缺少制度化到过度制度化，制度和解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挑战
- RCEP 和 TPP 是亚太地区融合的关键因素，RCEP 和 TPP 在很多国家眼里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15
观点**朱介鸣**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组主任；
城市分论坛嘉宾

学者通过对昆山和南海的比较研究，提出建造一个紧密而公平的城市。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建立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城市政府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农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自发发展。农村从原本封闭的、自治的方式走向城市化带来了弊端即乡乡差别。乡乡差别带来了发展中的环境恶化、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而昆山和南海的比较表明，昆山为农村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提供了借鉴意义，在规划过程中不应该过分强调地方利益和过分强调村庄的自制发展。

16
观点**燕爽**上海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社会企业高端圆桌嘉宾

■ 精神文明建设框架内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承担“分外之责”、道义之责和精神之责

“分外之责”要求企业在法律要求的本职之外，为所处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担负的“额外”责任，提倡企业感恩社会；“道义之责”是指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一员，理应在社会中彰显自身的德性，体现了对正义、美好和善的追求；“精神之责”是指社会发展始终离不开所有成员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同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应被纳入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

■ 社会单位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现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社会单位的社会责任更多地体现了“分外之责”，它以“社区责任”、“诚信责任”、“环境责任”等指标为内容落实“道义之责”和“精神之责”；但 2012 年上海履行社会责任得分前 1000 名的社会单位在满分 100 分的评价体系中的平均得分也仅为 72.4 分，其中 90 分以上的仅占 5.8%，而 65 分以下的却有 23.1%

■ 社会单位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存在不足之处

社会单位对特殊群体的关怀尚显不足；志愿服务的有效性有待提升；节能减排要求需进一步细化；慈善捐助活动形式较为单一，捐助总额总体偏低；政府诚信有待进一步提高

17
观点**Caner Bakir**全球化、和平与民主治理联合会联合主席；
世界经济分论坛嘉宾

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发现：

- 竞争力弱的银行系统会坚强一点，可以抑制过度冒险
- 财务稳健型同时受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的影响
- 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应对资产价格和资产价格泡沫受观念结构或央行的行动意愿决定
- 金融体系弹性产生的原因是结构、制度和机构级别的加强，或者银行行为比较保守

18

观点

William Powderly

华盛顿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公卫分论坛嘉宾

气候变化和传染病：即将到来的风暴？

1. 气候变化将增加人群传染病的发病风险。政府间气候变化合作委员会（IPCC）2014 年报告再次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将逐渐加剧，气候变化将引起全球气温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气候变化将导致媒介传染病的发生区域和时间的扩大，比如登革热、汉坦病毒和血吸虫病。以此将增加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难度并应该引起决策者的重视。气候变化还可能导致干旱并带来食物和饮用水的短缺。研究结果还显示脆弱人群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2. 公共卫生领域是不仅仅要加强自我对气候变化健康危害的理解和认识，更应该加强公众教育，以使社会各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19

观点

姚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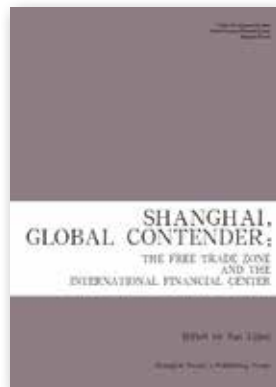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执行主任；
社会分论坛嘉宾

谁搬到了城市？

- 新生代流动人口在 20 岁之前就已经外出流动，超过七成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有意留在城市
- 在研究农民向城市地区流动的时候，考虑的要是农民自愿，不是受到强制因素影响
- 在以宅基地和农地换城市房屋的政策中，贫穷的群体相比富裕的群体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交换



出版物



《Shanghai, Global Contender: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打造上海自贸区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Asia's Wisdom: Explorations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亚洲的智慧：对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探索)



《亚洲的智慧：多元文明的统一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
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

2014年上海论坛共识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与亚洲发展崛起历史性地交汇，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度交汇融合、交织影响，国际创新要素流动空前活跃、重组不断加快，赋予了亚洲转型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对亚洲转型提出了严峻挑战。本届论坛紧紧围绕着“亚洲转型：寻找发展的新动力”主题，700余名海内外嘉宾就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关重大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亚洲发展的新动力就是转型，转型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掌握转型的主动权，才能率先实现崛起，走向繁荣。

一、科技创新是亚洲转型的不竭动力

为了塑造更加均衡协调的强劲增长态势，就必须加快亚洲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积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能量，以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支撑引领产业发展，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力开辟新的空间，以科技改革发展的新突破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跃升，激发社会进步的新活力，推动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开放变革是亚洲转型的思想旗帜

以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变革为先导，更新发展观念，转换发展模式，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坚持从易到难、从小到大、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不断推进的渐进式改革；通过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通过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为亚洲转型挖掘潜力和创造动力。

不断探索开放新思路，寻求拓展共同利益，扩大区域开放，提升开放水平，努力形成互利互惠、共进共赢的良好局面。采取更多实质性的开放措施，积极推进东北亚地区自贸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区域贸易便利化；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建立更为广泛的东亚结构，推动地区经济整合和互联互通，加快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高亚洲转型的竞争力。

三、和平合作是亚洲转型的坚实保障

亚洲各国应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增进政治互信，抛弃偏见、搁置争议，相互补台，共同发展，通过对话解决争端，通过协商化解矛盾，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探索，最大限度减少政治和历史因素的束缚和羁绊，共同应对各

种威胁和挑战，为亚洲转型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与氛围。

秉承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理念，以民生福祉与共享成果为目标，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友好合作，全面发展各国政府、政党、民间等各层次之间合作交流；寻求共同空间，丰富合作内涵，推进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面提升亚洲合作水平，探索互惠共进新模式，走好亚洲转型升级之路。

四、绿色环保是亚洲转型的重要支撑

亚洲转型必须坚决摆脱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路径依赖，加快生态优先、环保优先、节约优先的绿色转型步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形成绿色增长的战略导向与愿景，限制或减少碳排放，为亚洲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固本强基；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科学的方式，大力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研究，积极探索发展经济、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相得益彰的途径和办法，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最大程度地实现亚洲转型的绿色升级。

亚洲转型必须追求包容性发展，尊重各国公民的发展权利、发展责任、发展机会和发展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亚洲各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先，一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难题，实现共利双赢，保证所有公民都能从亚洲转型中获益。

上海论坛2014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发展格局，亚洲仍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来源。亚洲要谋求更大发展，使亚洲变革和世界利益的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就必须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响应时代号召，把握正确方向，进行彻底的转型升级，走出一条富有亚洲特色的超越与创新之路，惠及亚洲各国，造福亚洲人民，向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度复苏繁荣。

上海论坛（2015）子论坛承办申请公告

第十届上海论坛——上海论坛（2015）将于2015年5月23日-25日在上海举行。2015年是上海论坛第十周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上海论坛学术委员会在全球征集、专家研讨和媒体讨论的基础上，将上海论坛（2015）的年度主题确定为“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亚洲责任：创新合作模式”。

上海论坛（2015）设置了“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安全、生态”六个分论坛，每个分论坛下设5场子论坛，每场子论坛占时约90分钟。每个子论坛设置一位主席，由主席来统筹负责该子论坛的嘉宾邀请、议程设计、学术讨论、报告建议书等事宜。子论坛可以是沙龙、圆桌、对话、研讨会等多种形式。

各分论坛范畴如下：

政治：当今国际政治局势特别是亚洲政治局势热点讨论、趋势追踪和探寻；中国与周边国家冲突与合作；金砖国家的组织与合作等；

经济：全球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挑战和机遇及区域合作；中国经济创新与发展的难题、分析与展望；金融改革、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资本流动；金砖国家经济合作、金融创新、产业互补和竞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等；

科技：对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和影响的科技成果和科技革新；科技与其他经济、文化等领域结合带来的新变化；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转型和创新；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技术与政策等；

社会：城镇化问题与实现路径；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与保障机制；公共卫生与健康；超大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

安全：数据/信息化安全；环境能源安全与国际合作、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食品药品安全与规范等；

生态：节能与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气候变化及政策制定；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的对策与治理；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模式等。

上海论坛学术委员会现面向校内外各个组织机构，正式启动子论坛承办申请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 子论坛议题设置应在所属分论坛领域内，紧扣论坛年度主题，强调“大领域，小切入”；
2. 子论坛议题应聚焦当前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学术前沿，对公众和媒体有较强的吸引力；
3. 承办单位应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或社会资源，拟邀请嘉宾学者在该领域内具有世界级科研水准或社会影响力；每个子论坛正式嘉宾一般为6人（由上海论坛按照统一标准负责其来回交通费及落地费用）；
4. 鼓励不同组织、跨学科联合共同承办，鼓励与国际知名机构合作承办；
5. 根据上海论坛学术委员会要求，提交研究报告 / 政策建议书（3000字）；
6. 会前与该分论坛其他四组子论坛主席合作，举办一次政策研讨沙龙；
7. 能为上海论坛邀请到开闭幕式主旨演讲嘉宾者优先。

有意承办上海论坛(2015)子论坛单位或机构，请在上海论坛网站下载并填写“上海论坛(2015)子论坛承办申请表”，于9月30日前将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 shanghaiforum@fudan.edu.cn。

联系人：罗倩 沈郊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7楼

电话：021-55664590

传真：021-55790203

E-MAIL：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